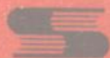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哲学思想

肖　前　卢之超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继无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哲学思想
肖　前　卢之超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7,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2074·436　　定价0.56元

目　　录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卢之超（1）
实事求是思想的新发展………………………邵华泽（18）
科学地概括和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齐振海（36）
掌握时代辩证法的搏动………………………张桂岳（49）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意义……………………………李秀林　郭　湛（80）
论真理的具体性……………………肖　前　李德顺（96）
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贾春峰　滕文生（123）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张晓林（135）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张义德（153）
关于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与领袖关系的
　　光辉论述…………………………………张义德（176）
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林京耀（200）

后　记……………………………………………（217）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

卢之超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上，尤为贴切。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础部分，它从哲学角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经验，贯串于毛泽东同志解决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经济、外交等各种问题的著作之中。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程及其伟大胜利在理论上的结晶，是近代中国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正如我们不能低估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及其深远的世界的意义一样，我们同样不能低估中华民族在理论思维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深远的世界的意义。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同志作出的结论视为不可逾越的顶峰，而应当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成就作为基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继续推向前进。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就是这样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是号召我们理论工作者这样做的。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特别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下，虽然

形式上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以至把它神化了，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也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同志在否定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同时，不适当地贬低以至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甚至怀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这样的态度当然也不可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应抱的正确态度。这就为我们严肃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前进指明了方向。

六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从哲学角度进一步概括的话，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文选》第133页。以下凡引《邓小平文选》只注明页码。）实事求是是一条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可表述为：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① 或者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②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唯物论或认识论的命题，而且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因为客观实际是发展变化着的，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把客观事物以及人们对它的

①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

认识看作一个在矛盾中发展的过程。同时它还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因为在一方面，任何认识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离不开社会实践；在另一方面，我们讲的从实际出发，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主要是从人类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存在出发，认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人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认识上的根本变革，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列宁主义的特点也是如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更是主要地产生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的革命改造。为着解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着重阐明基于社会实践的认识的来源与认识过程问题，阐明社会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概括。(2)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即矛盾论，从各个方面阐明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分析事物的特殊性及其根据，促成矛盾的转化，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方法论的概括。(3)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得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一系列规

律性认识的结论，特别是提出或发展了关于革命转变和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理论。此外，还包括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军事思想，文艺理论，等等。这一方面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部分，它的丰富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发掘。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贯串于对社会历史现象、对中国革命面临各种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中。其总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既服务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又是这个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有人认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起码是没有理解这种结合的实质及其丰富的哲学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必须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其中，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原则，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方面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但是，现在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都不能不带有新的时代特点，赋于新的历史内容。这就有一个发展问题。更何况，现

在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较之过去有很大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指出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实际上，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许多著作中，毛泽东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对于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都有新的论述和概括。今天，我们应当继承毛泽东同志未竟的事业，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是怎样实行这种结合的，以及研究怎样对实行这种结合的新经验进行哲学上的概括，得出新的结论。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就可以比较深切地理解《邓小平文选》中体现出来的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

东思想的行径，提出应当全面地宣传、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学习它的精神实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工作，首先是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入手的。邓小平同志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他几十次地反复阐述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以及伟大意义，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109页）；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上）。显然，实事求是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242页）可见，抓住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就抓住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关键。由此展开，可以带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实事求是，既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当前的世界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出发，都要力求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又包括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和分析方法，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各方面分析它的矛盾运动，反对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同时，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等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和今后的任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反对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有这些，都融汇在拨乱反正、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中，融汇在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确立新时期根本任务的过程中，融汇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融汇在全面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

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我们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这几年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件大事。

第一，就是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和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

由于长时间“左”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晚年在理论上的错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几乎每条战线、每个部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世界观上、哲学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首先是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任务的实现，是在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是其他一切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当然，这一工作主要是破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代迷信、“两个凡是”等等对人们头脑的束缚，恢复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若干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哲学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但它在结合实际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它所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仍然推动着我们事业的前进。当然，从哲学高度具体总结这一场斗争，是尚须进行的重要工作。这场斗争所涉及的许多哲学问题，如关于如何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什么叫解放

思想，以及对实践标准的理解等等，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与破除“两个凡是”等主观主义的东西同时进行的一件事，就是在恢复正确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当前世界和中国的国情，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拨乱反正，就是在批评和克服错误、混乱的思想的同时，把原来正确的那些原理、原则和结论，恢复和重新确立起来。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着重研究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世界状况和中国国情。批评错误的观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就提出要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一九七九年三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提出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中国特点实行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并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特点进行了基本的分析。这种分析，以后在小平同志许多讲话和党的其他许多文件中又进一步具体展开和逐渐完备。而对中国国情或中国特点的分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是与现代世界的基本状况（包括现代化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的了解和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邓小平文选》的论述中，在党的其他文件中，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研究。联系过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当时的世界状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参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哲学概括，比较二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可以列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若干课题，具体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些年来的运用

和发展。

第二，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中心任务的确定。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了政权，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的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什么？这是我国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但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因为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认识和处理它的矛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多年来在国际上也是聚讼纷纭。这个问题的解决，涉及许多方面，不仅取决于对中国国情（从它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到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矛盾，从它的历史特点到它的发展前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而且涉及对中国发展的世界环境，包括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等的正确分析。因此它多年来困扰着我们许多人，也困扰着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此有关。林彪、康生和“四人帮”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推到极端，大批“唯生产力论”，鼓吹穷社会主义，从反面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使问题尖锐化也明朗化了。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反对“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总结过去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党逐步从理论上明确了这样一些问题：(1)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虽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3)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他工作都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个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这三点，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它在《邓小平文选》里有许多阐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得到更加明确的概括。这些正确结论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重大转变，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根本上保证了今后工作的正确方向。这些结论看来简单，实际每一点本身都包含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这些正确结论的确立，是运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具体分析中国情况、总结历史教训、批判错误认识的结果。过去我们(包括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犯错误，现在党中央又是怎样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作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课题，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第三，是关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检验器，也是发展这个科学理论的最好实验室。我们都还记得，马克思在分析1848—1851年法国革命和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是怎样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的；恩格斯

在谈到同一问题时，是怎样说明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把这一规律作为"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并且"用这段历史检验他的这个规律"，"获得了辉煌的成果"的。我们也都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些事件，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知道这些背景，就可以了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历史的艰巨性、重要性和它的理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正是科学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其失败的历史教训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党花费很大功夫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科学总结，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决议。这个总结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文选》中有重要的记载。虽然不能说这种总结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继续深入，但就目前来说，它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都作出了科学的结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有人企图以某些领导人的偶然错误甚至个人品质、个人恩怨等等原因解释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唯心主义相反，这个总结从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出发，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具体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除了前面说到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形势、工作重心等问题以外，我想还包括这样一些问题：(1)以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分析党和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渗透在历史分析中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2)把我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个过程，放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经验教训的背景下，分析它所发生的错误和挫折。(3)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复杂因素和多层次上剖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实践，特别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4)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革命传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党内制度直至个人因素等各方面，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以及个人崇拜现象。(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认识高度上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6)由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引出关于今后发展的若干必要的结论。如此等等。在这里，哲学思想具体地生动地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中，不仅恢复了过去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确实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

第四，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但仅仅这样确定下来还不够。在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邓小平同志、党中央又陆续地提出许多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具体化和日益完备。例如，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的根本；提出建设高度民主，把它作为奋斗目标和任务之一；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刑事犯罪活动、整党整风等项任务，后来又把这些概括为四

项政治保证，等等，直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纲领。邓小平同志把这一切概括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文选》里看得很清楚。这是新的历史条件、新的根本任务下适合中国情况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而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仅仅开始，过程远没有完结，从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还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这里面当然有丰富的哲学内容，体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我的理解，从这里至少可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1)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化，以及中国的特殊道路。一般说来，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遇到的共同性问题，特殊说来，则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这是一般与特殊的问题，涉及到对《实践论》、《矛盾论》的新理解，特别是涉及对历史规律的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条件下的发展。(2)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原理，世界历史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四化建设的具体经济制度。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在经济理论界，这几年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多方面的探讨和热烈的讨论，为现实服务的方向是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在这种讨论中，有重要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历史唯物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很需要研究哲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志共同探讨。(3)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原则，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与根据当前现实采取多种灵活形式、灵活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简单地说，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现行政策等关系问题。这应是前面所说的规律性的认识在实践中的运用，涉及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目前、战略和策略、不管任何困难曲折都要坚持长远目标和必须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等等，同样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4）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唯物主义。不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忽视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保证也有很大的危险。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估计到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具体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抓紧机构改革等四项工作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有重要的意义。最近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又一次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对抽象谈论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异化”的错误的批评，向我们哲学工作者突出地提出了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性。抽象谈论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异化”，是哲学研究中的歧途。它一方面是现代西方种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回声，一方面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建国以来历史的错误总结。其特点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作抽象空洞的议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这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历史唯心论的思潮。

三、我们的任务

邓小平同志的文选，党中央的决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上，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为我们提供了典范。我们要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来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又通过哲学思想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这些方针、政策，进一步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哲学论证和哲学指导。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正确方向。小平同志多次号召大家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他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这段话，从根本上说明了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所以，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是很光荣的任务。

按照上述认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它的发展，我以为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过去由于闭关自守，我们对外国哲学的发展和成果，了解得很少，研究得很少。有时确有自吹自擂、夜郎自大的毛病。这几年发展文化交流，介绍、研究外国哲学的兴趣浓厚起来了，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外国各种哲学思想的介绍、研究、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做。但是这中间确也产生过一种倾向，就是有些同志追随西方某些错误思潮，把眼光向着远离现实的、消极悲观的、抽象空洞的历史唯心主

义议论，以此为时髦，甚至想从中寻找解释和解决我们现实问题的药方。相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百多年实践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丰富的思想成果，对中国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现实生活，没有兴趣，缺乏信心。他们的眼光不是向前，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是向后，向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主义空谈。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潮盲目推崇，对中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成果妄自菲薄。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表现。这种错误倾向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它是有害而不结果实的花，除了污染空气以外，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积极的思维成果。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与这种思潮划清界限。在努力吸取外国的积极的思想成果的同时，必须树立我们民族的自豪感，树立脚踏实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和中国需要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心。第二，要把哲学的研究与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探讨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不仅仅是研究这些具体科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等等，而且首先是研究这些具体科学中的特殊规律和内在逻辑，探索与这些具体科学特殊规律密切联系的哲学规律，然后，再从中作出更加抽象的哲学概括来。我以为这可能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较好方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它在今天的发展，都以这样的方法为好。当然，这就需要较多的同志在较长的时间内分工协作，共同努力。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

成新的理论。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经过对各门具体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在党的领导下的集体的努力，在将来能够写出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等，把我们民族的哲学思维提到新的高度。

回想一下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可能给我们以启发。当年，那些远离中国革命的关在象牙塔里的学究们根本看不起马克思主义，那些自诩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满足于指手划脚的空谈，不相信山沟里还能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面领导人民为中国的彻底解放而奋战，一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灵活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发展我们民族的科学理论而努力。究竟是谁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历史作出了最公正的回答。我们要以前辈的业绩激励自己，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实事求是思想的新发展

邵 华 泽

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几年来着重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邓小平同志用以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导各方面工作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贯串《邓小平文选》的一根红线。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为什么说邓小平同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示？本文想就以上这几个问题，谈一些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一

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最初出自《汉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党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原则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此，实事求是就有了崭新的含义，并为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提高党的战斗力方面的作用，在教育和培养干部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我们党的革命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实事求是的胜利。

但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鲜明地响亮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口号，仍然使人觉得非常新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由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不研究这些条件，就无法理解它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都知道，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鉴于我们党很快要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及时地有预见性地提出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确实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制订政策，注意研究国情，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民心，因而各项工作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逐渐地不那么谨慎了，并日益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失误，我们做过的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笑的一些蠢事，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发生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敌我混淆、是非颠倒，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肆虐，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这种思想作风的破坏，影响之广，涉及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实人受气、挨整，坏人得势、逞凶；说真话有罪，遭打击，说假话有功，受奖赏；任务指标越高越显得革命，坚持从实际出发倒成了保守、右倾；对领袖搞个人崇拜，把人当作神，对马列原著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讲话办事以风为准，反映情况报喜不报忧；政治生活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等等。确实是形而上学

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有人说，十年内乱不仅是政治上的一场浩劫，也是思想上的一场浩劫，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当然也要求在思想上来一次大解放。要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分清长期以来被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要重新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要对被诬陷的许多革命家和干部群众作出公正的评价，等等，这些都是人民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切，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历史前进的要求和关键。离开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就无法全面深入地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就无法走上正确的轨道，一句话，不实事求是就寸步难行。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却提出和坚持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通过阻挠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的恢复，来阻挠拨乱反正，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

人民在忧虑，历史在徘徊。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方针，正是在尖锐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提出来的。旧思想的禁锢被冲破了，新思想的闸门被打开了，它的批判作用、鼓舞作用、指导作用、推动作用，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反映在《邓小平文选》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有许多理论上的新贡献，主要之点是：

第一，阐明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第133页）又说：“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121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第109页)这样，实事求是就不仅是作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是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地位，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离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就建立不起来；离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就停滞了，不能发展了。这样，也就给了我们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把钥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第一条，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这就使我们对实事求是有了比过去更高的也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把实事求是明确地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突出地提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思想路线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名著中提出了哲学上两条对立的基本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这是唯心主义的路线。① 这哲学上的两条路线，也即两条认识路线、思想路线。遵循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要遵循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但是，把实事求是明确地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并且加以科学概括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就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第175页)一九八〇年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二月，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242页）这样的概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且言简意赅，好懂好记，易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和运用。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把党的思想路线用科学的语言在党章中规定下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第三，阐明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制订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密切关系。他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第176页）把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基础和关键，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角度，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在思想路线对头，对客观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自觉的能动性，从而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中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发生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必然要导致政治上的错误，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十分重视思想路线的问题，一旦发现政治上的失误，总是要找出思想上的原因，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纠正错误、防止错误重犯

的重要环节。也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指明了科学的广阔的道路。

总之，经过邓小平同志的阐发，实事求是的原理比以前更加具体和深刻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全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邓小平同志在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于新的实践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邓小平文选》所选的文章，从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开幕。在这七年的历史中，我们中国土地上经历了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了倒退、前进、停滞、发展的一个曲折过程。邓小平同志始终代表着正确路线，排除种种障碍和困难，把这场斗争引导到胜利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邓小平同志牢牢把握住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武器，就是实事求是，这就使他总是掌握着真理，总是赢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总是能在异常复杂的形势下给人们指出前进的正确方向。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看一看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解决各种难题，把历史推向前进的。

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他，这是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历史，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如何前进的原则问题，也是关系到是否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如何才能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林彪、“四人帮”搞个人崇拜，鼓吹“句句是真理”，把领袖当作神。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流毒并没有消除。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不允许说领袖有错误，当然更不能去纠正领袖生前所犯的错误，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另一方面，有的人又夸大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把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当然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反对这两种极端，主张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确有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拿他的功和过来比，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他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作具体分析，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特别是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个人的品质；对中央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错误都由一个人负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要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纠正，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和发展。这样一种分析，贯串着辩证法，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这本身就是对党员和人民的生动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教育，其影响是久远的。

关于对待历史的错误问题。对待错误采取什么态度，最能检验是否是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

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打击和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株连了无数的群众。要承认和纠正这些错误确实是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错误都是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犯的，许多同志都是参予其事的；有的是正确和错误混杂在一起，不是很容易辨别的；这些错误多数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过去长时期里都是把它作为成绩和胜利进行宣传的，等等。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要维护这些错误。邓小平同志则与之相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领导我们全面地拨乱反正。这集中地体现在他说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之分；对错误要按它的实质进行分析，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对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解决，大是大非必须弄清；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而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认识，指导我们的改革，如此等等。邓小平同志还多次谈到在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中自己的责任。正是这种对待错误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公允的态度，使得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解决了那么多复杂的遗留问题，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其中既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有一般干部群众，既有党内的，也有各民主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党派的，既有“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也有“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做到了严肃认真，有错必纠。这样做的结果，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安定团结，深刻地教育了党的干部，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威望，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好。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敢于这样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错误的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

关于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问题。思想战线上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过去我们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能不能正确地开展这种斗争，关键是对错误倾向是否能进行恰当的客观的估计。这种估计包括“质”和“量”的两个方面，即到底是否存在着错误倾向（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构成一种倾向）；如果存在，究竟是“左”的倾向还是右的倾向；如果两种倾向同时出现，那么哪一种倾向是主要的；这种主要倾向的严重程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就是脱离实际，从主观的想象和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对客观形势的如实观察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因而明明是“左”了，不承认是“左”，还一个劲地反右，把批评“左”的错误的正确意见看作是右，结果越反“左”的错误越加剧，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邓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问题上，表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善于审时度势，切中要害。他在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的“左”的错误。他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他抓反对派性，抓党的政策的落实，抓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抓关心群众生活，直到提出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等等，是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左”的错误

做法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用很大精力排除种种干扰，抓克服“左”的错误及其影响和后果，从总的指导思想，到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各项实际工作，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但是，当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怀疑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出现的时候，他敏锐地及时地向全党发出信号，有力地予以批驳，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在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认真进行批评和纠正的同时，强调提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出邓小平同志在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真正做到了主观和客观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左”、右倾错误的许多重要的精辟的论点，如解放思想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观点；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观点；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的观点；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的观点；只有打下理论和实践的根底，才能真正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观点，等等，都是对过去反倾向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理论的深刻总结，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过去几年来引导我们党和人民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对于今后我们党克服各种思想障碍，牢牢地把握前进的方向，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最集中地表现为根据中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强调实事求是，最主

要的也应该是要解决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的又是长期的课题。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 过去我们在建设中犯的错误，根本原因之一，是脱离我们国家的国情，没有从我国经济、政治和各种条件的特点出发。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总结和思考，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逐渐地从盲目性中摆脱出来了，总的方向已经找到并且往这个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了。那么，这个总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回顾三十多年来，为了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邓小平同志把这个总的指导思想运用于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国防和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从各个领域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设的原则、方针、决策，并且已经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效用。从经济建设来说，比如，关于发展经济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的原则；关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关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先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的步骤；关于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思想；关于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把国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关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经济体制，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想；关于农村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和发展生产，都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的思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是，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地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切合实际情况，并经常注意总结新的经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列宁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①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变化，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掌握哲学唯物主义这一认识工具，是多么重要！

三

邓小平同志在运用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但我们的认识不能停留于此，还要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面有些什么根本的经验，给我们以哪些最重要的启示？这样学习，才算是抓住了实质。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坚持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把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我们党主张、倡导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总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革命，推进建设，使人民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目的。这个中心点明确了，看问题就比较客观、公正，在工作中就能够努力地去反映客观实际，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和处理任何一个问题时，总是从全局出发，总是首先考虑到怎样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譬如，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他主张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因为不批评这种错误，就难以实现拨乱反正，难以总结教训，教育党，教育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但是，他又主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讲过头，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同时，他还强调不能因为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而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发生怀疑和动摇，因为对这个重大原则产生怀疑动摇势必要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对党的事业的利害得失作周密的考虑、比较，就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只有做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才能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大大提高了。而有的同志在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

想的评价上总是同中央不一致，由此而产生各种错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全局，只从个人的利益、感情出发，只图一时的痛快，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见，不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也难以接受党中央作出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现在，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不能再动不动就说一个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但是，立场问题还是要讲，看问题，办事情，都要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上，否则，实事求是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敢于和善于排除各种干扰，这是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不是没有斗争的，有时候这种斗争还会相当尖锐、复杂。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往往会有一些人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一个正确的方针的贯彻，也往往会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所以，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有善于发现真理的智慧，还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邓小平同志就有着这种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他抓住了真理，就要排除各种障碍，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大无畏的勇气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原则精神。譬如，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他为了贯彻实现原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决议》写得全面、科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要求"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在他提出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和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确建议以后，都曾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非议，但他毫不动摇，因为他认为他的这种建议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实际要求的。至于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为了解放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制订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更是充满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由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通过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然，这种干扰，绝大多数属于党内和人民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清道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因而，邓小平同志也强调要多做工作，多教育，多引导；解决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过去的“左”的错误，收到预期的效果。

善于发挥集体的作用，吸取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这是做到实事求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解释实事求是的时候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这里所说的“求”者，是指认识的主体，不能只理解为指的是个人，而首先应该是指的集体。千百万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总的说，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要靠党，靠群众。当然，个人在这里也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有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任何一个人，如果离开了集体，也就难以实事求是地

---

① 《毛泽东选集》1966年横排版，第3卷，第759页。

认识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认识国情、掌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而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就是因为他最善于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把集体和群众的正确意见归纳、集中，化为系统的意见，变成党的决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例，这是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的历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的科学结论。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所谈的对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写法，都很明确，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决议》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先后经过多次讨论，最大的一次参加讨论的有四千多人，不仅在党内讨论，而且听取了党外许多人士的意见，许多符合实际的好的意见都被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采纳，吸收到《决议》中去了。为什么《决议》能做到如此事实准确，分析恰当，是非清楚，功过分明，成为实事求是的光辉历史文献？道理就在这里。

对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不拘泥于原有的水平，而是不断充实、提高、发展，这也是做到实事求是所必需的。“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① 实事求是，不能从抽象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历史的具体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要求人们的是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事物在发展着，实践在发展着，人们的认识也应该随之发展、推移，使之适应发展了的新情况。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人们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0页。

的思想也应该是新鲜活泼的，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认识论的总规律前进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总是反复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强调不仅要摆脱不适应新情况的过去的老框框的束缚，而且要摆脱新框框的束缚，要把自己所获得的认识作为进一步发展认识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凝固起来，成为思想前进的障碍。我们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变化、实践发展而前进着的，当实践中提出新的问题时，他能及时注意抓住；当客观形势要求对自己的某些看法作改变的时候，他能迅速地予以补充或修正。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要求人们始终不能自满自足，而总是保持虚心、进取，在追求和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停步；要求人们不要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而要高瞻远瞩，有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能看得见、抓得住本质问题；要求人们不要犯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毛病，而要同人民、同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求人们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面对现实，光明磊落，唯真理是从。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容易，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推进自己的认识更不容易。开始认识比较正确，到后来思想停滞了，僵化了，因而陷入错误不能自拔，这样的情况，无论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科学发展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一定要经常吸取生活的营养，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前进。

邓小平同志以他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促进

和推动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从事任何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和少犯错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就会更加顺利。

科学地概括和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齐 振 海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本点，也是《邓小平文选》的精髓、根本点。实事求是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一致起来。简言之，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得出思想、概念，而不是从概念、框框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邓小平文选》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这个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的阐明和发挥。

一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哪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而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实践，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

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242页）"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第176页）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错误，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重大问题：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不联系中国实际，主观主义地搞一套？这是截然相反的两条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两条思想路线从一开始就激烈地斗争着。由于党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这条主观主义思想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并一步步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一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这一斗争历程的科学总结和理论表现。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极其丰

富的。它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其中始终贯串着的一个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做到实事求是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是“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也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中了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智慧，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创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实事求是”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的晚年却没有把这一原则坚持到底。这一方面说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坚持了并不能保证在以后也能坚持，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了并不能保证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能坚持；另一方面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原则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今天的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肩上。而《邓小平文选》，就是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

二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是怎样恢复、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呢？

第一，解放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权威。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内的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形势和国情的认识出现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又利用我们党的失误，把“左”的错误包括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推到极端。一时间，现代迷信盛行，寻章摘句成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随时可能招致祸端。于是，我们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受到了抑制，一些人的思想陷入了僵化半僵化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应该及时改变这种状态，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却没有这样做，反而推行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实质上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继续用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认识论上说，就是用已有的概念、框框去套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而不是去探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并得出新的思想、概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就不能不首先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不可能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勇气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开了思想解放的先声。接着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宣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管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

来。”这段话在思想解放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只要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就能体会到它的份量。

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中央领导同志上述思想启发下开展起来的。但是讨论刚一开始，就有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压制。六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这场讨论。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109页)他还批评了那种认为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犯了弥天大罪的怪现象，指出：坚持还是反对实事求是，“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同上)反对实事求是，“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第113页)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从此，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认为它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权威。从此，广大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二，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在于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了实事求是原则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在个人崇拜仍然盛行，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又要防止有些

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关键在于弄清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正确理解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言论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关系，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言论同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第40页）他还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第109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第121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明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就为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我们反对把毛泽东同志的只言片语绝对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他所写的文章以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出来的。但是，他的每一句话并不一定都代表毛泽东思想，他的某些言论甚至也会违背毛泽东思想。例如，他晚年背离实事求是原则时所说的那些话，就是如此。我们既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也不能矢口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靠摘引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言论、论断、结论，而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毛泽东同志的言论、

论断、结论等等同我国当前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它就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否则，无论是谁讲的，都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总之一句话，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党沿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而不会迷失方向。

第三，明确地把实事求是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从而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了新的高度。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多次谈到："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第133页）他还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133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把实事求是提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又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把它明确规定为我们共产党人一切行为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对实事求是思想作了更加完善的、科学的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写入了党的总纲，成为党规党法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四，明确地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把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密切结合起来。党中央反复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不仅是党中央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而且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任务。邓小平同志说："一个生

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44页）很明显，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走群众路线，脱离了群众，就谈不上实事求是。而要使广大群众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发挥创造才能，又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并形成一定的制度。如果象“四人帮”所干的那样，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就要进行追查，就要揪辫子、打棍子，群众的思想怎么能解放，实事求是又从何谈起呢？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第134页）。“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136页）。他还强调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293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加强民主、健全法制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如改革干部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集体领导，禁止个人崇拜；制定和健全各种法律，等等，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从制度上得到了保证。

第五，恢复和发扬了调查研究这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提和环节。没有对中国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

倾向作坚决的斗争。”（第109—11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调查研究十分重视，恢复并进一步发扬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就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所作的《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又在报刊上登载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一年写的《〈兴国调查〉前言》、《〈寻邬调查〉前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这一文献，为我们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理论，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大家都知道，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政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详细周到的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党中央在反复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的《关于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生动的一例。由于在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步伐。

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要调查研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也要调查研究。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3页）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时，不能简单地只当“收发室”、“传达室”。因为中央的方针政策，是针对某一方面的普遍情况做出的，而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特殊情况。这里就有一个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辩证唯

物主义告诉我们，普遍不能完全包含特殊，特殊也不能完全进入普遍。我们即使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字不漏地照抄照搬，也难于做到实事求是，更不要说有所创新了。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当“收发室”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第六，坚定不移地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经济建设中去，初步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它运用于我国国情的分析，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但是，“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步骤来实现现代化”呢？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实践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得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结论(参看第372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第109页)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过去我们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149页)他还对中国

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至少要注意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些特点。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以长期存在着“左”的偏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并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设想。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果断地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初步走出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新路子，逐步打开了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谁都知道，实事求是的首要之点，就是从实际出发。然而客观实际却是纷繁复杂的，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做到实事求是呢？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物质的运动过程，尽管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但却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果只看到事物现象，而不去探求事物的规律，那就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也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它不仅象其他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具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一规律表现得更为复杂。我们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能不能认识和掌握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能不能按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加伟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认真的研究，没有完全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三中全会正确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指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这是党和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取得的真理性认识，我们一定要永远牢记。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它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尖锐地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第371—372页）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靠我国人民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走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地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当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吸取。我们还要认真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合乎科学的管理经验，以改善我们的经营管理，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在各项经济改革中有选择地吸取外国的

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紧紧地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表现。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同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依靠人民群众。每一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新经验，归根到底都是群众创造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进行的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调整、改革、创新，无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实现的。如在农村普遍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合作经济的新形式，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出来而为我们党所肯定并加以推广的。

仅从上面列举的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运用和重大发展。它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概括的那样："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掌握时代辩证法的搏动

张 桂 岳

列宁曾经指出，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贡献的地方，也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对待和总结历史的经验，观察和解决现实的问题，批判和纠正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潮，提出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都在《邓小平文选》中有生动的体现。《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时代辩证法的搏动，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将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坚持观察的客观性
一切从客观对象的辩证本性出发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提炼和升华。列宁在谈到辩证法的要素时，首先指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①。列宁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并加上重点号，表明它对于辩证法的意义和作用：它是辩证法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分界线。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

辩证法的客观性表明它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息息相关，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辩证法及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中的辩证法思想都具有这个特点。《邓小平文选》中辩证法思想的特色就在于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客观辩证法的本来面貌。进入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历史的伟大转变和把我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国家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解救出来，必须拨乱反正，才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振兴社会主义祖国。这时，客观存在着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伟大功绩与晚年的错误，如何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如何评价我们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功过，如何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和建国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等重大问题。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在这个时期，还客观存在着经济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反“左”和反右的关系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临纷繁复杂的矛盾，只有真正做到列宁所说的“观察的客观性”，做到“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即如实地反映时代的客观辩证法的本质、全局及规律，才能获得比较切近实际的正确的认识，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实践，推动社会前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依靠感性经验和一般常识是无济于事的；仅仅具备辩证法的一般原理的知识，照抄照搬，也是不可能科学地概括和总结新时期的客观辩证法的本质及其全貌的。解决这些历史的新课题，需要有深湛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修养，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有运用自如的辩证分析方法的艺术，更需要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求实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观察的客观性，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客观辩证法，并加以正确的解决。

众所周知，在当时对维系着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和形象，维系着我们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维系着十亿人民的情感，维系着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的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问题，如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敏感和困难的问题，又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会造成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混乱。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忠实于时代的客观辩证法，极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客观地、辩证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个人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同集体领导的关系。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第263页）这就防止和避免了对毛泽东同志作孤立的个人评价。这种评价是不符合客观辩证法的。在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活动中，无论是正确的部分还是错误的部分，都同我们党和国家、同党的集体领导息息相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客观地、辩证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第306页）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当时存在的不符合客观辩证法的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的"左"的思潮；另一种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右的思潮。这两种思潮殊途同归，都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辩证法，背离了观察的客观性。

第三，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是毛主席一生中的主要的方面和正确部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第262页）我们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正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澄清了一些人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混同起来的糊涂观念，维护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第四，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效果区分开来，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问题根本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然而直至临终，他仍不自觉其为错误，还以为自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了反修防修，这是他的悲剧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和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应如何评价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肯定“文化大革命”吧，显然就不能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吧，又怎么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使许多人感到棘手的极为复杂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忠实于历史的客观的辩证法，指出：“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第305页）这就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实际效果作了区别。这不是割裂动机与效果的联系和统一，而正是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客观辩证法，避免了动机与效果等同论。由此出发，就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从根本

上区别开来了。他还指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中(又加上被“四人帮”所利用)，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东西，做了一些好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古今中外少有的复杂的问题，经过邓小平同志(包括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了认识。这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复杂问题的光辉范例。

第五，说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从个人品质上去找原因，而应寻求产生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制度上的一些弊病。对于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什么也会犯错误，有的人感到不理解，结果就从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去找原因。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某些制度方面的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甚至毛泽东同志说的许多正确的话，因为某些制度上的原因，也被推向了反面。因此，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或我们党所发生的错误归结为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问题，这是违背列宁的“观察的客观性”的“枝节之论”，是寻求“大事件的小原因”。邓小平同志则注重客观辩证法的本质联系和全局问题。他在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致力于干部制度

和工作制度的改革，强调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正是抓住了事实的“全部总和”，“事实的联系”，即抓住了全局和本质联系，因此他的评价是“胜于雄辩的”，“证据确凿的”，堪称坚持和贯彻辩证法客观性原则的典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背离观察的客观性，即背离辩证法的客观性，那么你对于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就会视而不见，从而陷入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② 比如，由于胜利，不够谨慎，听不进正确的意见，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对于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左”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也看不清楚，甚至把它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坚持、推广。这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来讲，就是缺乏观察的客观性，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邓小平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同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坚持了观察的客观性。《邓小平文选》就是邓小平同志客观地、辩证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光辉记录。

观察的客观性，贯串于《邓小平文选》的各个篇章和始终，它包含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规定性。

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观察的客观性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文选》贯串了这条基本红线。

其二，坚持观察的客观性，是为了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但这只有透过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用事物的本质来说明事物的现象才能做到。因此，"观察的客观性"不等于直接性和表面性。只看到表面现象，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就非犯错误不可。从《邓小平文选》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观察问题总是排除简单肤浅的议论，透过表面现象的分析，抓住事情的本质，正是这样，才忠实地反映了复杂事物的本来面貌。

其三，客观事物都是辩证地存在和发展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事物辩证法的反映。因此，"观察的客观性"就要求我们从客观事物的矛盾出发。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如果把事物看成"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① 《邓小平文选》处处忠实于客观事物的矛盾本性和辩证关系，如实地抓住客观矛盾，辩证地解决客观矛盾，因而，许多错综复杂、棘手难解的问题，在邓小平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79、380 页。

同志手里迎刃而解了。

其四，矛盾是在发展进程中产生和解决的，并通过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把社会推向前进。《邓小平文选》真实地记录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四人帮”的斗争，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矛盾，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向前的历史。所以，辩证法所要求的观察的客观性，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 反对思想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邓小平文选》正是这一学说的丰富内容的生动体现，全书充满着辩证分析的方法。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提出要准确完整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文选》中坚持和运用辩证法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一个典范。全面性、完整性、体系性是辩证法的要求，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上，出现了严重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更是把这种错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毛泽东同志的话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在毛泽东著作中寻章摘句，只要背诵片言只语，不求理解精神实质；甚至说什么“句句是真理”，等等，这些都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违背辩证法全面性的恶劣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两个凡是”便是突出的例证。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无法实现历史性的转变，无法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因而也就不能统一全党的认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针对这些情况，早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在抓各方面的整顿的同时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第33—34页）邓小平同志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歪曲，提出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更加鲜明、更加坚定、更加深思熟虑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从《邓小平文选》中反复地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毛泽东思想体系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即贯串于毛泽东同志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这一点作了

这样的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即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引者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①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即他的主要观点和学说。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② 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里所说的观点和学说，即是指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或基本原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同志还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第256页）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此作了科学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六个方面以它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要对毛泽东思想作准确、全面、完整的理解。对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要如此，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一方面、某一观点的理解也要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人帮'，特别是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40页)

第四，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绝对化，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不是绝对的体系、终极真理的体系、封闭的体系，而是科学的体系、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随着实践内容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这样做，任何体系都会僵化，变成教条，从而失去它的生命力。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如此明确的规定和科学的阐述，是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性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并不是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提出任务和制订政策，必须着眼于大局，从全局出发，正确地处理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的辩证关系，把全局和局部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步调一致地协作行动和向前发展。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该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该按部分提口号，应该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道路的缝补部分破绽的行为。”① 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早在一九七五年，他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357页。

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全力纠正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大局的"左"的错误，扭转破坏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辩证关系的做法。他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第4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全局思想，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和头脑，如果囿于眼前的局部的利害关系，如果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是不可能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问题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九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第149页）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同时提出今后（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这样，全局的总任务的实现，就有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保证，而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局部在统一的全局之中，"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着充分发挥自己作用和展开自己前景的天地。

正确处理这个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极为重要。这是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接近于解决以后一再出现曲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未曾解决的重大课题。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性的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各条战

线、各个方面的局部工作没有能够围绕这个全局展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冲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真正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大局，明确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和全局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有照顾全局的观点，必须懂得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邓小平文选》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第205页）"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第142页）这明确地告诉人们，各行各业都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全局观念，照顾这个全局，服从这个全局，促进这个全局，决不允许挖这个全局的墙脚，拆这个全局的台，拖这个全局的后腿。一切有碍于这个全局发展的思想，都必须纠正，一切对局部有利而对全局不利的做法都必须加以制止。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之间互相牵动、互相制约。局部必须服从、照顾全局，这是一方面。但是服从、照顾全局，并不是取消局部或排挤局部、轻视局部。因为全局不是抽象的，它只能通过各个局部表现出来，通过各个局部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全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干部四化，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不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如果不进行整党，就不能达到目的。只有围绕全局，各行各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全局才会欣欣向荣，大有希望。

因此，全局也有责任和义务支持局部、为局部创造条件，使局部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十分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辩证地分析和处理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是《邓小平文选》中坚持辩证法，运用辩证法的一个鲜明的特色。邓小平同志面临和处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复杂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比如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我国充满着象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矛盾：既要破除个人崇拜对人们的束缚和禁锢，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事业的指导作用；既要承认二十多年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又要肯定和坚信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有力量的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既要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还存在着弊端，又要充分肯定和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要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反动的东西，又要引进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用的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既要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又要搞活经济，坚持开放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同时，我国面临着一些全局性的、战略性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问题，如经济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的关系，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思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现行政策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

无论是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都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辩证地解决，任何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都势必会犯错误，历史给予我们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

邓小平同志辩证地分析和解决上述一系列重大的复杂问题，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一方面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极大的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同时任何时候也没有放松对来自右的思潮的警惕。邓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他在一九七九年说明为什么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也指出："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第152页）《邓小平文选》所体现的辩证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全面性，反对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正确处理各种现实的和历史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坚持辩证法的发展观　反对思想僵化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对客观事物合乎规律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概括和总结。列宁把辩证法看作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邓小平文选》提出的解放思想，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生动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设置了许多思想理论禁区，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同时，旧的习惯势力也束缚着一些人的手脚，使他们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社会主义就得不到发展。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提到了“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

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我们说的思想解放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主观与客观符合，思想跟上形势的发展，从而促进事物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反之，如果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安定团结的政治方向，这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思想解放，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这种自由化不是我们社会的积极因素、促进因素、发展因素，而是我们社会的消极因素、破坏因素和倒退因素。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向前看，看到情况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第139页）所谓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邓小平同志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是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另一方面是过去未曾存在的情况出现了，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产生了。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新的情况，全新的问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

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第165—166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对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这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所要求的。邓小平同志抓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化为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具体方法，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

《邓小平文选》中贯串着这样一个鲜明的思想：联系历史、面对现实、放眼未来。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两个关系，即现实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的正确解决。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则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人类社会发展总链条上的三个互相衔接、不可分割的环节。历史转化为现实，现实又成为历史并转化为未来的现实。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永远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的生命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也就在于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邓小平文选》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决不可能自发地到来，它需要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思想的指导，还必须通过人们实践的奋斗。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正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四化建设，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只顾眼前的、局部的利益，鼠目寸光，斤斤计较，那么，我们必将失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制订全部现行政策，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的全部现行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也必须以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作为思想上的保证。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

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结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是，继承、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一光辉思想和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371—372页）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如果我们进行哲学的思考，加以哲学的论证，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独到的和出色的运用。毛泽东同志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①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个辩证法的精髓，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既体现共产主义一般原理，又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课题。

第一，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揭示了普遍真理的含义和规定性。他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第157—158页）

什么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列著作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坚持。在我党历史上，有人曾把马列的本本，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把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意见都当作普遍适用的真理，要求人们句句照办，条条照搬。后来，林彪、"四人帮"也曾别有用心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某一句话，某一条语录说成是万世不变的绝对真理，来骗人、吓唬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又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此种种，说明什么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邓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小平同志以其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极其明确、肯定地提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指作为我们行动指南的构成马列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原理。而那些任何伟大人物都难免的个别失误的论断，那些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适用的某些具体的原则，我们决不能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这就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行动指南。

第二，明确提出了什么是中国当今的主要国情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这对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这个共性来说，是个性、特殊性。这个问题，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八大会议上，是解决得比较好的，思想上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最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阶级斗争当作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了。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失误和实践上的失足，说明实际上没有找到中国的个性和特殊性，自己对自己不认识、不了解。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如何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呢？这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中国的个性、特殊性，从而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第三，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完整的结合和

有机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结合和统一的典范。他在强调特殊性、个性，即中国特色的时候，决不允许排斥、否定共性和普遍性，即普遍真理，同样，他在坚持共性、普遍性，即普遍真理的时候，也决不允许抹煞个性、特殊性，即中国特色。具体点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我国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既包含了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带共同性的成功经验，又突出了从我们自己国情出发所创造的具有民族形式的独特经验。

辩证法认为，共性、普遍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离开个性、特殊性，共性、普遍性就成了虚无飘缈、不可捉摸的抽象的东西。当然，个性、特殊性也不是离开共性、普遍性而孤立存在的，世界上不与共性、普遍性相联系的个性、特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无论是离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性、普遍性），或者离开中国实际情况（个性、特殊性）都不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就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得到了完整的结合和有机的统一。

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决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当前，我们国家农村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现，这些特色，有的是成熟的，有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创造发展。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从大范围和全局而言的。此外，

还有国内的全局和局部的结合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来说是共性、普遍性，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制订出来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各地、各战线、各部门都必须贯彻执行；各地、各战线、各部门相对于中央来说，是特殊性、个性。具体情况各有差异，因此就要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全国各地、各战线、各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使各地、各战线、各部门的工作具有自己的特色。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3页）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进一步延伸，这个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是各条战线的同志都必须深切理解和正确处理的。

在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如何对待别国的经验，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列宁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邓小平同志也同样极其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第278页) 这说明在解决国与国之间，即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时，也要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走自己的路，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而在中国呢？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发扬辩证法的革命性
大胆而有秩序地全面地进行改革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邓小平文选》中体现出来的又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坚持和发扬辩证法的革命性，强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胆而有秩序地全面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对于旧的东西，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是批判，对于新的东西，它是创造。改革，就是批判性、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改革，从总体和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使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据这个理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要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这就从总体上、原则上和方向上解决了改革的理论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贡献。但是，改革过程到底要破什么，立什么，以及改革的途径、方针政策、办法等具体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对于我国一些具体制度本身的弊端的改革，更没有触及。

《邓小平文选》在改革问题上，运用和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改革的思想，解决了毛泽东同志未曾解决的问题。他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种种弊端，关键是搞好这方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经济方面，就有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等问题；在政治方面，存在着违背民主集中制以及如何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等问题；在组织方面，存在着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等等。

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不改革上述经济、政治、组织等方

面的弊端和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艰巨复杂任务的关键。

经济、政治、组织方面的种种弊端的存在，或多或少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有关，同"左"的右的思潮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有关。邓小平同志在讲机构改革的时候，十分重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第295页）"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第296页）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这两方面的批判结合起来，至于以批判哪方面为主，则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由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现象，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扬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战斗精神，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妥善地解决了破与立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于破与立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身包含破与立两个侧面，是破旧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强调

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片面性。这些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教训：片面地强调破，以为革命性就是破，只要把旧的东西破了，新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地立起来了，把立、创新看作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过程因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结果呢？破了旧的，立不起新的，这样，旧的不仅不可能破彻底，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反复。

邓小平同志在发扬辩证法的革命性时，既十分重视破，破除、改革不合时宜的东西，同时也十分重视立，制订新的方针政策，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树立新的思想作风，开创新的局面。前者为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任务更为艰巨。只有把破与立，破旧与创新紧密地、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既破得彻底，又立得牢固。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第356页）"精简"、"出"这是破；"选贤任能"、"进"这是立、创新。邓小平同志把破与立看作"是一道手脚"，使破旧与创新紧密结合，这是对辩证法的革命性原则的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不仅在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性问题上解决了破与立的结合和统一，而且深入到各个工作领域，就破什么、立什么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经济方面：在管理方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破小生产的、官僚主义的管理方式，立现代化的科学的管理方式；在管理制度上，要破制度不严，无人负责的现象，立岗位责任制，赏罚分明的制度；在经济政策上，要破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立按劳分配，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劳动、多做贡献而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要破官僚主义现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等等，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如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等等。

世界观和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同志反对肢解和割裂毛泽东思想，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破"两个凡是"，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四项基本原则；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结合和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革命性，这本身就包含着科学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个问题，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在一个时期，对革命性作了"左"的理解，一讲革命和批判，就忽视科学，实际上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了。不讲科学性，必然是正确与错误不分，良莠不辨，甚至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加以批判，把错误当成正确的东西加以坚持。

在对待肃清封建主义遗毒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第295页）邓小平同志从三个方面说明对封建主义遗毒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他指出：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社会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

糟粕的界限；最后，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

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第298页），他举了有些地方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为例，说明这个口号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因为没有充分的调查和分析。

邓小平同志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保证了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破得准确，立得完整，破得有力，立得牢固，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人们的社会主义创造精神不断地迸发出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得到发展。《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改革的指示，集中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和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原理在新时期的又一实际运用和发展。

恩格斯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① 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批判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潮的时候，辩证法是我们锐利的战斗武器；在进行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劳动和具体工作的时候，辩证法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思想武器。

列宁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我们党依据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文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典范。因此，学习《邓小平文选》中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就要象邓小平同志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劳动和工作；就要象邓小平同志那样，把唯物辩证法当作一种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地对待历史，辩证地认识现实，辩证地瞻望未来，提高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总之，要象邓小平同志那样，掌握时代辩证法的搏动，指导伟大的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辩证法，宣传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意义

李秀林　郭　湛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的实际运动，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这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照辩证法办事，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所得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仅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两方面意义的相互辉映，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之自觉能动的特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

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根据

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十年的斗争实践，早已反复印证了列宁的这个著名的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

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建国以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没有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际运动的发展程度，是同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重视正确的哲学思想对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陈云同志说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跟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感到获益非浅。在我们全面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邓小平同志也十分赞成这个意见。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第33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在实践中掌握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只有学好哲学，才能在理论上有扎实的根底，才能对实践作出科学的概括，并正确地指导实践，做到“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第337页）。

今天，我们应当着力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不用于观察、分析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就无从体现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指导，就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从实践还是从哲学理论上说，都是有深厚的根底的。明确提出和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表明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具有了必要的哲学根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书斋哲学，而是实践的哲学，是行动中的哲学。坚持实践的哲学、行动中的哲学，本质上是把这种哲学看作实际行动中的思想路线。反过来说，思想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是其认识论）在实际行动中的体现，是实际行动中的哲学路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第64页），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根本目的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和贯彻政治路线的思想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第13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党的思想路线作为行动中的哲学路线，它使高深的哲学理论和蓬勃生动的现实生活彼此相通。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联结起来的桥梁或纽带，它既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制定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为贯彻这条思想路线作出榜样。毛泽东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概括说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是如此。他不仅在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讲理论问题时总是力求深入、透彻，不讲空洞的道理，使人似乎能感觉到理论背后确凿的实际；讲实际问题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贯穿着实在的道理，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例如，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第97页）字里行间充满了务实的精神而又包含着深刻的哲理，生动地说明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什么样的战斗风格、反对什么样的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是对唯物论的尊重，同时也要求照辩证法办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因为一方面，客观事物本来就是辩证地联系和发展着的，彻底的唯物论必然是辩证的唯物论，必然要如实地承认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原则本身就体现了辩证法，它要求人们遵从辩证的思维规律，去"求"（研究）

"实事"中所固有之"是"(客观的辩证规律)，达到主观辩证法同客观辩证法相符合。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内在地包含了照辩证法办事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世时多次赞扬过邓小平同志懂得辩证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结论的提出，正是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唯物而又辩证地考察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又一光辉范例。

二、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矛盾的辩证运动确定战略重点

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认清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由此确定我们全部工作的战略重点。战略重点的确定是建立在对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基础之上的。以往我们在工作上的重大失误，从根本上讲都与没有抓准主要矛盾从而未能正确确定战略重点有关。而要正确地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真正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想当然出发。

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其理论根据在于统观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辩证运动，实事求是地认识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根据当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工作的战略重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主要矛盾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事物的辩证发展，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又会突出出来。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171—172页）我国的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172页）在这种条件下，尽管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第168页）使我们全党达到这样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是很不容易的，前前后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徘徊瞻顾和曲折反复。只是在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彻底地坚持了实事求是之后，才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的认识，才实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正是由于我们实现了这个战略重点的转移，因而才为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创造了基本的前提。很明显，只有实现全党工作战略重点的转移，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要不要集中全力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则是在解决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在中国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前者，即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也不可能真正地使它付诸实现。所以，在我们党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之后，又进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表明我们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纵观我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成功的实践，起码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哲学启示：第一，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集中主要精力来抓社会主要矛盾，以此为依据确定总任务，统筹各环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被次要矛盾所纷扰。这是一个理论上十分清楚、实践中容易忽视的问题。第二，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发展的性质。由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社会诸矛盾的此消彼长中存在、发展和转化。将它视为僵死的、固定的东西，必然会使主观同客观相背离，因而必然要在实践中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第三，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全局出发来确定主要矛盾。什么是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据不在本本上，不在某种一般原则里，而只能是存在于具体的、生动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现实中，并且必须是由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根本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从某方面、某局部的现实出发来判断主要矛盾，也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社会现实、人民利益和全局要求，是我们确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发点。第四，在抓主要矛盾时，又要求围绕主要矛盾，分别轻重缓急，有秩序地进行工作，一

环扣一环地逐步解决各种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多次报告和谈话中反复强调：要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键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又在于改革那些与它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所谓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体系，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照辩证法办事的高超艺术。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带有自身特色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客观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着内在的必然性即规律性。这种历史的过程和客观的逻辑在理论上的概括反映，是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理论原则，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实际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①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统一，这种特点当然也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建设。融汇了各国本身的特殊之点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主义建设的理论，必然带有各国的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某些国家之间无论怎样类似，也都各具独特之处，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任何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在正常的、合乎规律发展的情况下，都必定是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某种原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盲目模仿别国，未能充分发挥本国的特点。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抹掉本国的特点，只不过它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显示着自己而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总趋势看，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从自己的实践中吸取了经验教训，逐渐抛开了对某种现成模式的迷信，相继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在各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的逐步展开，越来越明显地揭示着这种内在的逻辑，并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中来，促使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符合这种客观逻辑的决策。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尤其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这是我们在考虑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同志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第 371 页)"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第 149 页)关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是一个需要全面调查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的。但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底子薄，起点低；第二，人口多，耕地

少。对于这两个特点，不能仅仅从消极的、凝固的观点去理解，而应当以积极的、辩证的态度去对待。这两个特点一方面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困难，同时也为我们发挥已有的人和物的条件中的巨大潜力提供了可能。同样，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的特点也都需要辩证地加以考察。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构成该国家或民族特点中的两个矛盾的侧面。只要我们明了自己的特点，努力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进而扬长补短，就能够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为背景的，更多地是针对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俄国的具体情况与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很不同的，但同中国这个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相比，俄国更带有欧洲国家的特点。如果说俄国与英、美、德、法等国相比是特殊的；那么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就更是特殊的了。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是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趋势，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后怎样促使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我们目前时期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即在于此。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实质上，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则本来就只有在各国的具体道路中才能体现出来。离开具体的发展道路的一般或必然性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但这种必然性在各国的实现过程又必然各

具特色。这两种必然性(或一种必然性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任何在主观指导上的分割，尤其是看不到或者轻视后一种必然性，势必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害。这已为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曲折的探索历程所证实。

总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这就是常规，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四、共性和个性、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统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处在辩证联系之中并且本身就包含着辩证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从外部关系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有各具特色的各国社会主义之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各自的个性中贯穿着共性，在各自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既由于各自的个性、特殊性而相互区别，又由于其中的共性、普遍性而相互一致。从内部关系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共性和个性、普遍和特殊的辩证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包含着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是共性、普遍性，中国特色是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共性和个性、普遍和特殊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处在辩证的联系之中。

作为一般和个别这两个侧面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只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能在观念中通过概念的抽象加以区别，而在实际上、在客观现实中却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中国特色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存在和发展。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乃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这种特色必须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反映这种规律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如果孤立地强调中国特色，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会与别的一般（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相联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各国特色单独存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不带有中国特色。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 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表现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义实际运动，都不可能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进行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会鲜明、生动地体现这种一般和特殊的统一。

应当着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所指出的根本方向是社会主义一般，对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而它的着眼点却在中国的特殊。这是因为，首先，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漠视后者而只注意前者，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用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来排斥和否定本国的具体实际，这实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际上不是在维护和坚持、而是在驾空和损害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社会形态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他们所作的主要是(不完全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工作。而我们的任务则在于运用这个一般于本国的特殊，做大量的、他们所没有遇到过的、创造性的具体工作，即主要是(不完全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工作。最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表明，通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普遍原则而是中国的具体实际，我们所感到知识不足的也主要是如何把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变成我们活生生的实践。我国建设事业的重大失误往往是与此有关的。正是基于这些事实，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才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在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积极主动、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实践导师们的科学预言。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和中国特色之特殊的统一，既在整体上又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前面论及的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在这里就表现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系。斯大林在论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指出：这一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这是一个对于社会主义的共性、普遍性的一般概括，它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则带上了中国的特点。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1 页。

决议中写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上述两个表述相对照，可以看到，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表现了中国本身的特点，即由于经济的落后而造成的这一矛盾的尖锐性和解决这一矛盾的迫切性。在经济方面，也明显地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一般与中国特点的紧密结合。我国目前多种经济形式的结构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而在多种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又表现了明显的中国特点。在政治方面，也同样如此。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共性；同时又带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

总之，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有机地结合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具体地、历史地统一在一起，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具体道路。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过程：基本的出发点和奋斗的总目标

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但是作为实践活动的过程，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的。从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已经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不太成熟的有本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例如在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早在五十年代我们就比较自觉地根据本国实际走着一条与苏联等国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如实地承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在现实中，也就是承认我们已经有了个基本的出发点，一个继续前进的基地，有助于我们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

同时也应该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成为自觉的、明确的命题，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根本指导思想被强调，毕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而它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是一个有待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以分为不发达的与发达的两个阶段。如果说通过以往的努力我们已经建设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和记取。面对空前伟大而又艰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已有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新的领域还在摸索之中，在我们面前还有大量的必然王国。从现有的出发点到达到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是一个充满了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的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奋斗的出发点，又是我们奋斗的总目标，同时也是这个奋斗过程本身，是起点、过程和目的三位一体的结合。

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宏伟事业内在的辩

证关系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要求我们把理想和现实、宏观和微观、长远和目前辩证地统一起来。崇高的理想和扎扎实实的工作，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总的宏观目标和细致的微观要求，长远的方向和分阶段的步骤，总体的布局、规划和各方面的具体措施，都统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之下。在这个总题目下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是一项宏伟壮丽的社会工程。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我们就能够更有信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第315页）

总而言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为此而制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措施，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这个思想中包容着丰富的哲学含义；同时也对哲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分析现实生活、研究新问题、作出新结论指出了方向，树立了榜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无疑会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带上中国的特色，进一步也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应地得到发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论真理的具体性

肖 前 李德顺

真理的具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列宁曾多次强调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①。真理具体性的原理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真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而且是引导我们的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无论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探索今后的正确道路，我们都应该时刻把握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读《邓小平文选》的时候，体会尤其深切。

一

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之一，是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的体现，是坚持真理具体性原理的光辉典范。我国革命和建设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中国具体化的胜利。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发生的失误和挫折，则往往是由于违背了真理具体性原理的结果。回顾过去，分析现实，展望未来，可以说，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具体真理论的觉悟和行动，便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始终深刻地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极大的魄力和热情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真理论原则，并为此而同各种有害的倾向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林彪反革命集团曾经打着"高举"的幌子阉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口号下，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把它变成片面的、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甚至公然抛弃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主张用孤立的"老三篇"、"老五篇"代替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第33—34页）他还针锋相对地批判"四人帮"继续推行林彪那一套，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并意味深长地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第34页）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为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可能。可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邓小平同志洞察形势，看到了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割裂从而使之片面化、抽象化的错误倾向并没有克服，反而有继续发展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实行毛泽东思想。所谓“准确”，也就是要在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每一论述时，都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都不能离开它与具体实践的具体联系。当然，“准确”也离不开“完整”。而“完整”则是指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第36页）。这就是说，我们在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每一个论述、每一句话时，都不能撇开它们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论述的具体联系，都要弄清楚它们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既要准确，又要完整，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我们在对待任何事情时都要坚持它，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当然也必须坚持它。总之，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实行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具体真理论，就是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对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态度。从这一原则出发，邓小平同志彻底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它否认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联系，抹杀真理的具体性，只能使人们陷于空洞的抽象，造成思想的僵化；这样做不仅不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区分了“真正的高举”和“形式主义的高举”即“假的高举”两者的界限，从而解决了“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他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121页）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必须是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违背了这一要求，就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这样的“高举”只能是“形式主义的高举”，“假的高举”（第123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真理具体性的思想，在他关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政策和方法等问题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坚持真理具体性原则的问题，不仅是同真假“高举”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问题和思想原则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同党的整个思想路线，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

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总结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条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就包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真理论原则。只有把我们所坚持的和追求的真理看作是在实践中具体地历史地发展着的客观真理，才能深刻地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同时，党的思想路线也正是使我们能够揭示各个领域中具体真理的认识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第133页)如果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思想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

正是在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及时地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这个迫切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72页）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真理论所必然得出的理论的、逻辑的结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真理具体性原则的典范。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是贯串于《邓小平文选》始终的一个重要思想。《文选》记录了邓小平

同志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丰富成果，其中到处可以看到坚持真理具体性原理的巨大意义和力量。

二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真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内容。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着重发挥了其中两个方面的哲学思想：第一，关于真理的全面性。要把真理看做是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的科学体系，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和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体系，从中任意地抽取个别原理，使它孤立化、抽象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第二，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随时结合客观实际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中的变化发展来理解和运用真理，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使我们的思想不致僵化和脱离现实。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所谓“具体”，就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即事物是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同样，真理也必须是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真理具体性的一个方面。列宁说过：“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① 只有全面而完整的正确认识才具有真理性。片面性的认识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成为真理。全面性是具体真理的基本要求。真理是全面的，它才是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具体的；正因为真理是具体的，它必须是全面的。根据真理全面性的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详尽地了解事物的各方面性质、特征和联系，尽可能多地掌握事实材料，在做出判断的时候，要力求反映事物的全貌，防止以偏概全，以蠡测海。当然，要在认识中穷尽事物的一切细节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① 在实际生活中遵照全面性的要求去对待事物，可以保证我们不断地沿着真理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界。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全面性，反对片面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们尽可能全面地认识了当代世界或中国实际的一切方面，并尽可能地反映这一切方面之间的关系，把这些认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次还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不自认为已经最终地穷尽了世界或中国的真理，相反，它恰恰是自觉地为进一步揭示真理开辟道路，在自身内部准备了防止和克服片面性以及僵化的一切条件，以此来保证自己作为全面的真理性认识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任何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把它的某些原理、结论孤立化、绝对化的做法，都是直接违背它的真理观和真理体系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全面地学习和宣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实行毛泽东思想，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如实地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真理的体系，而不是许多孤立的个别结论的机械的堆积。他说：“毛泽东思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第40页)这里指出：第一，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是它的新的发展，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割裂开来；第二，毛泽东思想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体系，决不能把其中的某些原理或结论同整个体系割裂开来。邓小平同志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决反对任何割裂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此，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抵制和批判。针对江青、张春桥一伙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邓小平同志也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第39—40页)他还进一步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例如，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尽管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看法并不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四人帮"撇开毛泽东思

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立场和正确态度，利用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说法去污蔑和打击知识分子。我们如果不是全面地看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因而也不能同“四人帮”的谬论划清界限。鉴于这一类的许多教训，邓小平同志建议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第41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思想，对于我们的一切科学的、真理性的认识和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一向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及其过程都是复杂的、多方面因素和多种条件的统一。因此，对任何事物的正确认识，都不可能用一句话、一个结论或一个原理就完全地表达无遗，都需要同其他的正确前提、原理、结论联系起来。真理、正确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体系中才能成立并充分显示其丰富涵义的。我们无论是理解已有的真理，还是去探求新的真理，都时刻不能忘记真理的全面性要求，都要在全面的、完整的体系中加以把握。在这方面，《文选》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教材。例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结论是确凿无疑的具体真理。它既抓住了重点，又体现了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全面性。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且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局实际情况发展的必需，是各种矛盾的焦点。邓小平同志正是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了我国的各方面情况，才抓住了主要矛盾，为党制定了这一战略决策的。他说：“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

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第240页）因此，必须把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坚决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开展经济建设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只是搞经济工作，还必须有全面的完整的规划和措施，“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第213—214页）

再如，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如果不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性，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会达到具体的真理。因此，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要有全面的观点，只有这样做出的评价才能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他说，评价毛泽东同志要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第263页）从全局的高度出发，邓小平同志全面地分析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功与过的关系，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是主流。在此之后，他又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不应仅仅着眼于个人，而应看到“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第261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第293页）。从健全党的各项制度着眼，不仅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个人，而且进一步得出了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深刻结论。这样分析和解决问题，其结论有极大的说服力，是毫不奇怪的。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事物总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反映事物的真理也必然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列宁说："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① 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等条件抽象地对待事物，认识就不能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就是僵死的观念，而不可能是真理。真理是一个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过程，它要求人的认识把握动态的历史条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体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观察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反对静止地、僵死不变地看待理论和实际。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前进着的理论体系，唯其如此，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具体的。凡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静止化、凝固化、变成僵死教条和公式的观点，凡是用凝固不变的现成结论对待事物的态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邓小平同志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真理论的原则：第一，他继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强调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单纯背诵词句、停留在现成结论上、照抄照搬照套的本本主义；第二，他充分论述了必须尊重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历史条件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运用发展着的实践来检验理论，反对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方法。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题，解决问题。”（第113页）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本意是想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错误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即使撇开这点不讲，这种主张也会把毛泽东同志针对某种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讲的正确意见变成抽象的、僵死的教条。对此，邓小平同志坚决地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35页）其所以不行，是因为它违反了“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只要清醒地想一想，谁都不难理解，离开了一定的时间、地点等条件，对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可能做出正确有效的回答。但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有些人却不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从思想理论方面来说，还是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作怪。

真理是一个过程，这里面包含了真理的基本精神的正确可靠性是不变的，而真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分寸和条件是发展的。具体的真理既是确定不移的，又是发展的。这种确定性和发展过程的统一，只有在认识的不断运动中，通过实践的推动和检验才能够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令的修订过程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第114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第115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都是这样不断发展着的。它们的“基本精神”即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变的，不能违背的，不会过时的。

不坚持它们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在贯彻实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必须随时注意历史条件。为了教育全党正确地把握真理的过程性，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掌握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的意义。他指出，对于已有的正确结论，要弄清楚它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得出的；在把具有普遍性的正确结论应用于实际的时候，要弄清楚实践的对象、过程和各种条件有了哪些变化，从而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第114页）高度重视新的历史条件，并把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是《邓小平文选》中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特色之一。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和国家所做的重大决策中，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在这一方面，他不仅以自己的卓越贡献做出了示范，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向全党同志进行宣传，对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第116页）

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理论战线上，邓小平同志历来反对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孤立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口号和结论，而是从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背景、含义、社会作用和实践目的及效果等方面加以具体的把握。例如，列宁曾经说过，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于这段名言，如果忽视了列宁所

指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尚未被铲除和改造的情况，而把它抽象化、绝对化，就会得出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个体小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的土壤这个极端错误的、有害的结论。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是这样曲解和篡改列宁的原意，从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战线上制造了一系列灾难的。我们正确地理解列宁的原意，就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小生产不但不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领导下，这些小生产最终将汇合于公有制经济之中，而不是相反。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的不是批判小生产，“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第274页)结论与林彪、江青一伙正好相反，是非截然分明。这说明，联系历史条件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何等地重要！此外，如邓小平同志对“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提法的拨乱反正，指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灭资兴无”等口号的片面性，对“又红又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的科学解释，对于谈论抽象“民主”、“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对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等错误观点的批判等等，都体现了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出发，运用实践来检验是非的原则。这些，不仅就结论来说，尤其是就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来说，确能给我们以如何坚持真理具体性的深刻启发。

三

贯串于《邓小平文选》中的真理具体性思想，始终围绕着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是一句空话。"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第261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121页）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和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弄清楚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关系，是《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真理具体性思想的中心。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一直十分重视并不断深入地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包含着抽象与具体的深刻哲理。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是具体的，但是它并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抽象。对抽象本身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些脱离具体实际的空洞抽象。列宁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 凡是科学的抽象都能够回到具

体的实际。只有这样，即做到科学抽象同具体实际相统一，才能使抽象的科学性得到证实，得到保证。只有这样，科学的抽象才不致于被架空，使它脱离具体的实际这个它赖以成长并从中不断吸取营养的土壤，而变成枯槁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因为这些原理本身是科学的抽象，它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和根本规律，这些本质和规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纯粹的空洞的抽象，而是对无数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概括，是包括具体实际的丰富性的抽象，是包含了无数特殊表现的普遍，是蕴涵着丰富个性的共性，是体现在许许多多个别中的一般。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于当代各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都毫无例外地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拿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是具有个性的具体，中国的历史特点在世界一般历史中是个别。但是，中国的社会历史从来也未脱离过、将来也不会脱离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发展的。这就说明，在中国社会这个特殊、个性、个别之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共性、一般。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这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根本指导意义。任何否定马克思主义真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理的普遍性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企图，都是割裂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的，都是违背辩证法、违背人类历史客观规律的，都不能不受到惩罚。

但是，正如任何科学抽象都要舍象掉某些表面的细枝末节一样，任何普遍都不是把一切特殊的全部细节都兼收并蓄、包揽无遗。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为一切具体问题都提供了现成的具体答案，或者使它变成一把能够供人用来剪裁现实的剪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中，也包含着普遍和特殊两个相对的层次：它的立场、基本原理和观点、方法，是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实践的对象和条件的，这就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成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还有许多是针对某个具体实践得出的一个个正确的结论、方针、策略和方法，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带有一定相对特殊性的成分。这里说的“一定”和“相对”是指，这些带特殊性的成分也不是纯粹特殊的，其中体现着、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性内容。当马克思主义被“放之四海”的时候，它的这些特殊成分与我们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之间，必然不能简单地一一对“准”，而需要用其中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际出发，独立地得出新的具体结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普遍适用性的原理和结论，由于它们也不可能把一切特殊和个别的细节都完全包括进去，而在发展着的现实中也必然会有与现成原理或结论不完全相符的内容，因此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原理作出进一步的校正、丰富和发展。上述两种情况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辩证思考和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的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的过程。正确地体现这一过程的最高表现，就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实行这一原则的过程及其产物——毛泽东思想。

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最坚决地重申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重新恢复和发展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科学涵义。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第109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仍然要把毛泽东思想同今天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第122页）这里面既包括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已有的正确结论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做进一步具体化的工作，又包括对毛泽东同志过去没有讲过的、或者讲错了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当年，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第121—122页）今天，我们也只有这样去做，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成功："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

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同上)根据我国现实的情况和条件，邓小平同志对于实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今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作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概括：“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122—123页)

这个总目标确定之后，还有进一步贯彻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是：我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完全模仿和照搬别国现代化的模式、走别人走的路，还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出自己现代化的路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搞现代化。虽然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方面有着一些普遍的规律，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彼此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各自有自己的国情，彼此的经验也不能互相照搬。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每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也都要把普遍规律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有些人由于不懂得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道理，一提搞现代化，头脑中想的就是外国的、甚至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为把别人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实现了现代化。针对这一类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

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第371—372页）必须坚持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思想——“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同上)因此，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根本前提下，从中国的人力、物力、环境和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372页）这一结论中，包含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原理的具体应用之间的辩证统一，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世界各国指导思想、共同规律、根本道路的一致性与具体条件、实际形式、民族特色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包含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的辩证统一。它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光辉体现，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成果。这一基本结论所揭示的，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真理。

四

在坚持运用真理具体性原理解决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和策略问题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注意把这一

原理化为具体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以启迪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提高党的工作水平。

（一）解放思想，具体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工作，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思想懒汉作风。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过："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① 十年浩劫曾使得这种"幼稚者的蒙昧"重又泛滥起来。邓小平同志首先挺身而出，发起了拨乱反正的"启蒙"教育。他号召全党：要反对教条主义，要解放思想；要反对思想懒汉习气，提倡勇于独立思考；要敢于面对具体实际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一句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和处理具体的情况。他提出，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坚决反对套用抽象的公式和固守僵死的教条，并且率先垂范，把这一精神贯彻于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各项工作中。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第278页)“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第279页）这个原则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精神在处理兄弟党相互关系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毋庸赘言，它必将对促进兄弟党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从而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和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国内方针来看，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要求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当然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按中央的指示办。但是，具体实际是复杂多变的，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因此不能事事都等待中央有了具体的指示再办。事实上，中央不可能代替一切地方和一切部门解决那里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央的大政方针规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正确原则，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需要经过各级领导机关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创造性实施。因此，基层一定要善于从本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主动地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放手去工作。“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

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第65页）只有切合具体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才谈得上是具体的；也只有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那种对待中央和上级指示，不问本单位具体情况如何，也不问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如何，只知道照抄照转、简单机械地搬用的思想懒汉习气。他说："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3页）中央的正确指示反映了各个单位的共性和本质，是更深刻的东西，但是它不可能包括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的特点、个性。如果不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化为适合自己特点的具体措施，就不可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样也就会使上面的指示变成软弱无力、缺乏实效的抽象教条。这种本本主义的作风，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的，实际上是对上级指示的消极抵制，是败坏上级指示的做法。

在这里，要真正做到科学地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正确指示，就必须做到使普遍和特殊相结合，而解放思想则是一个关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243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第323页）在各项具体工作中，思想解放的具体表现，应该是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负责精神，开动脑筋，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独立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上级没有想到的，我们可以想；上级没有叫干的，我们看准了可以干；如果上级指示有不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地方，我们可以变通办理；如果上级的某个决定错了，我们可以向上级反映，同上级争论。只要服从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目标，这样做就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集中统一，反而更利于全党团结在中央周围的集中和统一；就不仅不会违背真理，反而会加快沿着真理道路前进的步伐，与此相反的精神状态，恰恰是与党的事业，与党中央的决策相背离的。邓小平同志说："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44页）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重实效，不尚空谈。

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们的思想就不可能符合具体的实际；不面向实际，注重实效，也无从检验我们的思想同实际相符合的程度。这些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因为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地胡思乱想。解放思想的实质是要从实际出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具体地、深入地了解实际。

国情，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如果对国情没有深刻的具体的了解，那么一切努力

都可能落空。可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对自己国家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是很不够的，甚至连必要的统计数字都没有。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第167页）调查研究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又是一项时刻都必须进行的具体实际工作。这工作不仅理论工作者必须做，一切从事党的工作的人都应该去做。我国疆域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资源、交通等条件极不相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因此，不仅中央要调查研究，对国情有一个总的具体了解，而且各个地区也都有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各个地区的工作都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拿农业来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第276页）

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无论哪一级都要调查研究，从具体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有层次的，因此正确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具体性也是有层次的。这就是说，"具体性"也是具体的，不应当对它作抽象的、凝固不变的理解。例如，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工作所要求的具体就是有区别的。中央的决定符合我国的整个国情，它是正确的，是具体的。但是对各个地方以至基层来说，就不一定很具体，也不可能太具体。各个地区和基层单位还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更细致入微的具体情况，使中央的决定更进一步具体化，才能使贯彻中央精神的工作落在实处，见到实效。所谓见到实效，也就是解决具体的实

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实效越大，说明贯彻中央的正确指示越充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越充分，二者的结合越充分。反之，则说明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或者没有把它同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用工作的实效而不是抽象的议论或主观感觉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按照真理具体性的要求，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具体表现之一。

注重实效，力戒空谈，是在经过斗争确立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后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只有这样，具体的真理才能够发挥它的具体作用，显示它的实际力量。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第96—97页）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都是缺乏实际内容的空洞抽象，它们是同具体真理背道而驰的东西。而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踏踏实实的态度和讲究实效的精神，正是真理的具体性所要求的工作作风。世界上没有比实际更具体的东西。真理若是脱离了实际便不再是真理；坚持真理若不注重实效则必然流于空谈。在《邓小平文选》中，处处体现出的注重实效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正是邓小平同志坚持真理具体性原理的又一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在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尤其应该加以发扬光大。

我们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学到不少马克思主义关于

具体真理论的道理。《文选》中活跃着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坚定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真理具体性原理的精神。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时期中，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水平上，深入地理解和宣传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并把它充分贯彻到四化建设中去，对于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贾春峰　滕文生

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邓小平同志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举了安徽肥西县和凤阳县的例子，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于是，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邓小平同志明确回答：“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第275页)

生活实践在教导着我们。从邓小平同志这次重要谈话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三年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

得了举世瞩目、振奋人心的发展，当前更是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亿万农民的伟大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系列论述的正确性，证明了他所阐述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概括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确定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第240页）又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第180—181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贯串整个《邓小平文选》的中心思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学习体会和初步认识。

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谈起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科学所揭示的一个客观真理。自然界有自然界的矛盾，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进步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绝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存在矛盾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都说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

的发展一样，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运动，它仍然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里，至关紧要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作出了合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怎样认识和处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把目前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第168页）这个重要思想，后来写进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就是党章的总纲中的这样一段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论述，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一九五六年召开的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不久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经及时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情况，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八大同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由于我们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没有能够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结果，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种历史的曲折，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一九七八年三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第94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决定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的确是我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反映了我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唯物史观的时候，是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都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事实出发的，即任何社会的人们，都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活动，也不会有社会历史。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① 后来，列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社会历史，又作了这样的阐述："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②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必然引起政治上层建筑与全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当然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说过，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这里所论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四个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论述了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第214页）所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

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第213页)所有这些论述，都卓越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根本的指导意义。

前不久，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指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所揭示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在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显得特别迫切，因而它很自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愿望。人民知道，只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地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逐步满足人们关于吃、穿、住、学习、研究、劳动、创造、交往、旅行、娱乐、休息等等的需要。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活动，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都要围绕着并且服务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目标。”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的一系列论述，具有多么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切围绕这个中心

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和政策。而这些科学论断和方针政策的提

出，都是紧紧围绕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都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基本点出发的。

他论证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决定作用。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保障。

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反复不断地阐明这个重要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他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了衡量各条战线党委领导的标准。他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

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他从怎样使党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有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里的根本要求，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但是，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呢？他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任务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他认为我们多年来的体制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积极地有效地进行体制改革，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

他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必须重视教育、科学的地位，重视智力开发，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靠空话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我

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而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他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论证了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人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运用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因此，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认为，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大家的思想和眼界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他从进行四化建设出发，提出工作方法必须加以改进。他说，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

总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都不能干扰、损害这个中心。《邓小平文选》中对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阐述，都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的。

当然，我们这样认识问题，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方

面工作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代表党中央提出，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后来，他又指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四项重要政治保证，这就是：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

党中央多次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努力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

党中央还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的优越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新型民主的优越的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第173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第154页）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也就是说，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我们决不可以有丝毫轻视或放松。因此，在党的十二大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前，对于党章修改草案中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增加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邓小平同志认为“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但是，他紧接着又说，“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第240页）

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沿着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方针，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开拓前进。让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为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张晓林

邓小平同志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我们科学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深刻理解和实行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复杂事物的各种矛盾，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找出主要矛盾，并确定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途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进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对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

展的基本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是我们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指南。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指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制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

由于正确认识旧中国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并由此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各个革命的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适用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这个口号就不再适用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没有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真理。真理如果多走一步，就变

成了谬误。列宁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①] 又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在于这个口号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违背了目前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第 168 页)

由于我们党长期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在进入了新历史时期以后，面对新的环境和局面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 155 页) 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实体，"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

---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①]列宁在谈到阶级定义时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看，构成阶级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生产资料已经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显然已经消灭了。这样，阶级矛盾理所当然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不再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主题。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已经彻底干净地消灭了阶级斗争。事实上，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而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长期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因此，解决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必须经常注意的问题。但应当看到，无论如何这种斗争“不同于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第155页)所以，我们绝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大量的、支配全局的现象，看成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应该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动摇的认识。

既然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消灭，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再表现为社会的阶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不再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当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仍然还存在着矛盾，生产关系也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解决，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可以而且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下，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的首要任务已经从破除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人们在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结成了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关系，广大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日益形成共同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此，历史上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少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享受要靠掠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满足的现象一去不复返地完结了。人们可以团结一致，向自然界开战，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共同的物质文化需要。显然，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共同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题。

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和你死我

活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目的。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富裕、幸福。我国人民长期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都是为了铲除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改变在剥削制度下被奴役、受剥削的地位，摆脱贫穷与落后，不断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获得长期渴望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而这只有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进到共产主义，当然所依赖的条件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进程中，自始至终处于关键性的地位。舍此，社会主义无法建设好，共产主义也无从到达。

更为现实的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存在着许多错综交叉的矛盾。只有抓住并解决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才能顺利地较好地解决。例如，当前还存在着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存在着诸如住房、交通、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因此，只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

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从上述分析看，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正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矛盾进行客观的考察和全面的分析的结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经济、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因而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具有更大的紧迫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曾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列宁说：“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②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人们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出这样的例子。但问题是这种阶级斗争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现象，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总和。不能因为我们党政机关确有坏人，甚至有的单位确被坏人所把持，就说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内、政府内，就说相当多数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正是我们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把一些阶级斗争的例子误作为事物的全部总和，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而横遭批判。实际上，所谓的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在谈到唯物史观时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恩格斯也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实践，这是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庞大的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竖立其上，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如果要用"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的话，它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这和唯物主义的"唯"强调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以说，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现的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深刻变化，展现一派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这种大好形势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分不开的。这一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第145页)

理论对社会实践生活的巨大变化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实践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往往起源于理论上的突破，并在新的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早在一九七五年，他就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的核心任务。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在一九七九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尔后，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起草的党和国家各种重要文件和文献中，又反复强调和论证了这一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夺取政权

的无产阶级将"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也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之后，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 又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③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把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待的。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因此也就不可能从理论上具体地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列宁虽然参加并领导了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但列宁在世的时候，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完成，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尽管列宁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对苏维埃政权、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但也没有能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详尽的具体的论述。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有所前进的。他正确地宣布苏联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35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86 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起了新的变化，提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始终关注的主要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他也有很大的失误。一方面他在很长的时间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矛盾，不存在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把实际生活中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普遍化，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导致了阶级斗争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问题上曾有一些正确而又精辟的论述。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①。他要大家明确认识党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上)。他还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②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宣布"革命时期的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② 同上书，第1318—1319页。

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很清楚，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同志相当重视生产建设，曾经把它摆在一切工作之首，作为中心任务来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时说："《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第259页)。然而这些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并未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甚至后来背离了它。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适当的估量，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也曾设想在反右斗争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并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领导讨论和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但是他并没有摆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错误理论上走得更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展开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

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到党内，并认为“党内的阶级斗争”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更为重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导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被林彪、“四人帮”别有居心地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全党、全国人民蒙难十年的历史悲剧。

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论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纠正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点时也说到：“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第149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也是我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随着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的“八大”正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并且指出，我们还要继续同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还要继续巩固

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性的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都曾取得可喜的成绩。可以想见，如果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八大”所确定的工作重点，我国的生产力无疑将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将会比现在更辉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将会得到比现在更显著的改善和提高。邓小平同志说：“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象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第213页）事实上，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偏离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工作重点，一切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中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来的前进与曲折，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集中地说明，邓小平同志指导全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符合我国社会目前时期的现实情况的。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我们党的中心任务的论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认识上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因此，说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是毫不

过誉的。

三

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始终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形而上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虽然明确了主要矛盾，但却把它强调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以致于成了“唯一”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只抓主要矛盾，而对其他矛盾不问不闻，漠然视之，自以为这些矛盾可以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实际上是取代和抹杀了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的错误，不仅在于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于用阶级斗争取代其他一切矛盾。另一种是虽然也区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但却在解决次要矛盾时，脱离甚至冲击主要矛盾的解决，用局部的、部门的工作冲击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都贻误了主要矛盾的解决。

与这两种倾向相反，邓小平同志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上，一方面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并同时注意解决其他矛盾；另一方面在解决其他矛盾的时候，又始终注意围绕着主要矛盾而展开，并为主要矛盾的解决服务，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

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我们全党的中心任

务，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抓好，也就是说，必须牢牢地抓住主要矛盾不放。他告诫说："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第240页）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第213页）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同上）这表现了邓小平同志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决心和意志。

但是，邓小平同志认为，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并不等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第213—214页）"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第214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其间不仅有经济建设问题，也有其他建设问题。不可否认，经济建设是处于主导地位，支配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或排斥其他的建设。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并不等于其他建设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为其他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反过来，其他各方面问题的解决，也促进着经济建设，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绝不能忽视经济建设之外的其他建设的必要性。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能把经济建设搞成"单打一"的道理所在。

基于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抓社会的安定团结，指出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指导全党解决历史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坚决纠正冤、假、错案；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同时，邓小平同志还着手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提醒全党"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第329页），在经济领域内展开了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另外，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第125—126页）。

总之，邓小平同志在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同时，注意解决其他矛盾、其他任务，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解决。

当然，解决其他任务，必须围绕而不能脱离主要任务，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主要任务，不然的话，不但不能保证主要任务的解决，相反会成为解决主要任务的干扰的因素、冲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要求各行各业都要自觉地服从这个"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利益"，反对一些部门以自己业务的特殊性为理

由而削弱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和服务，更反对把这种业务工作凌架于经济建设之上。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在具体抓科学技术工作、教育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理论工作、文艺工作的时候，都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求这些具体工作坚定不移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绝不能因其特殊性而摆脱甚至损害经济建设，而这也是衡量具体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展望前景，任重道远。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兴旺发达，就一定能胜利地向前推进。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张 义 德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党中央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得到了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180页）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实现这项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探索的不断深化；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党在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且在理论上有自己的创造。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坚持社会主义、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之一的高度。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从精神文明的内容看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在把这个基本原理应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又不可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等同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尤其是不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定的物质文明是一定的精神文明的客观基础和物质条件，但是，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两种成果，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进步的程度。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物质和精神之间复杂关系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我们在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要对精神文明的不同内容分别看待，不可笼而统之，流于简单化的结论。

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曾经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第326页)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的科学规定。按照这个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包括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思想，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建设，一方面是思想建设，而思想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

按照邓小平同志对精神文明两方面内容的划分，我们再来看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精神文明的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同物质文明的关系是直接的；而精神文明的思想领域，同物质文明的关系是间接的。所谓间接，是说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在这里，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和政治上层建筑等就是它们之间的中间环节。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中间环节，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精神文明又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如果忽视这些中间环节，就把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如果把物质文明等同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把精神文明等同于上层建筑，同样是把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简单化了。因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之一，而并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上层建筑，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之一，而不是精神文明本身（当然政治思想是属于精神文明，但它不同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产物。社会的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一方面精神生产的物质条件要由物质生产来提供，另一方面，精神生产者（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的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的物质生活资料，

要由物质生产来负担。社会的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越雄厚，社会的精神生产就越发达，为社会所提供的精神财富就越丰富；反之亦然。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 这个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相适应，也就是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考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社会生产方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一定关系，即社会生产力；一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② 这就是说，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精神生产的性质，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同样，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的精神文明的性质，也是由这两者所决定的。

对于精神文明的内容的不同方面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96页。

系对它们的决定作用有着不同的情况。如邓小平同志所论述的精神文明的教育、科学、文化方面，其中一部分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一般地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受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制约。但精神文明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则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所决定而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服务的。而精神文明的性质，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是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和封建主义精神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现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发展前途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组织纪律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核心和灵魂是共产主义思想。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同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例如，关于道德，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三种道德：过去传下来的封建主义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的未来道德。其中无产阶级道德是代表着对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也就是共产主义道德。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又超出于这个基础，因而是这个基础的否定的因素。它在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悟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身上体现出来，成为他们为推翻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为本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动力。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也是如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第326—327页)"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327页)

但是，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都不占统治地位；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及其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它们总是这样那样地排斥和围攻共产主义思想，力图扼杀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而这种状况的改变，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① 就是说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的胜利，才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改变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统治，而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取得支配的地位，才有可能建立起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第153页)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

有人认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现在还不高，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不了解精神生产具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点，不了解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往往存在不平衡关系，把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简单化而造成的错误看法。精神生产不仅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且以先驱者传下来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并对它们进行改造，从而表现出它的相对独立性。因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候都是同步前进的。就连同物质生产的关系最直接的科学事业，它同经济发展之间，尚且存在着既相对应又不完全对应的现象。那末，精神文明的意识形态方面，它同物质生产的关系的不平衡的表现就更为明显了。马克思在说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同例如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

比例的。"[1]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哲学，更是如此。恩格斯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2]认清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而精神生产归根到底为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关系，对于我们现在处理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现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就对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悲观态度。在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那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曾经在党的教育下培育出"井冈山传统"、"延安精神"；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物质条件也比现在要差得多，可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不但是我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受到各国人民交口称赞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第326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丧失信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条件，不仅是社会物质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第二，即使就物质生产力来说，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经济，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充分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就能够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当然，我们在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也不能把这种关系绝对化，因为这种不平衡关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因而它也是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第153页）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展开，我国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会逐渐发生变化：既不会出现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危机严重的状况，也不会使物质文明不发达而精神文明（主要是思想道德方面）相对地高的状况长久地保持下去，而是在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发展当中逐渐趋于一致，实现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平衡关系。而

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将对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且保证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

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前面说的是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现在再看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作用。对此，也要按照精神文明内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方面的划分，分别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看：任何物质文明，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离不开人类智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第84页）他论证了科学同生产的密切关系："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第84页）可见，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部门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对物质生产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为物质生产开辟道路并决定物质生产的发展方向；而作为物质生产成果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物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同志还从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基本因素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第85页）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84页）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重要作用，从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个指导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它为确定科学和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邓小平同志论证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与四化的关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第83页）又说：“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第47页）“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第45页）“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第65页）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把科学和教育同农业、能源和交通一起列为战略重点，充分体现了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这方面对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方面还对思想建

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如胡耀邦同志所说，教育、科学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① 这后一方面的关系，则是精神文明内部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了。

那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对物质文明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前面已经提到，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精神动力；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样要以此为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说：“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第326页）他又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第327页）建设高度

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的物质文明，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生产工具是人所创造并由人所掌握的。生产者的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先进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伟大的理想和信念，高尚的道德和情操，能够赋予人们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发人们高度的劳动热情，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去克服各种困难，搞好物质文明的建设。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第85页）这就充分说明了劳动者的政治觉悟作为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建设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的作用。

在说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的时候，我们也并不否认物质鼓励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第136页）那种平均主义的"吃大锅饭"的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纠正。只有把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这里，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精神万能论，一是精神无用论。精神万能论，一方面是离开客观规律而片面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因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一方面是离开群众的物质利益把思想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但是，在纠正精神万能论时，有的人又走

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导致了精神无用论，抹杀先进思想的作用，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从而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片面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显然是不利于四化建设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第297页)因此，在实现按劳分配、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时，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只有把实行按劳分配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才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有效地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而不致导致“一切向钱看”；但在反对“一切向钱看”时，又不可把经济工作中的物质利益原则也一起反对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先进思想和道德的精神动力作用。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的保证。物质文明的内容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之分。但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归谁享有，物质文明建设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发展，在不同的制度下是根本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

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很进步，但由于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在精神领域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空虚、颓废和堕落现象。这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①但是，这种矛盾和对抗，并不是从物质文明本身产生的，而是从对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也就是说，对物质文明的"不道德应用"而产生的不道德，并不是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第153—154页）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和对抗的唯一出路，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第154页）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代之而起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矛盾和对抗，情况就有了根本的不同。拿我国的情况来说，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

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物质文明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使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根本不同的。而且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要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这个发展方向，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靠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之一，其意义就在这里。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①

在说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是从空地上建设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人类文明的全部有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使之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为满足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25页。

和精神生活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和创造人类最高的、新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第154页）为了实现四化，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但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思想的渗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入而紧锁国门；也不能因为坚持对外开放而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放任自流。在这里，关键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学习和吸取其进步的、有益的东西，抵制其反动的、腐朽的东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须的，也是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必须的。邓小平同志说："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第328页)因此，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意义就在于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

总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根据这种辩证关系，我们既不能认为精神文明可以离开物质文明，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也不能认为只要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两个战略目标。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仅是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发展文化科学事业和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物质文明的建设是以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目的的；而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人民的政治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是为了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造就具有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和高度思想觉悟、高尚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从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意义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

人们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改造社会的成果是社会制度的进步，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是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包括事业方面的建设（如经济事业的发展，科学文化

事业的发展，思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供人民享用；而且包括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而且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上。社会主义新人，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根据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所起的不同作用，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成果。只有这样的新人，才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重任。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所绝对必需的，也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关于"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的论述的重大意义；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对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工人阶级是现代文明的支柱，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石。"① 工人阶级不仅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而且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不仅如此，工人阶级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文明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96页。

和精神文明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最有理想，最有纪律，是人类历史上道德最为高尚的阶级。而工人阶级的这些优秀的品质，是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锻炼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① 由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使得工人阶级既不同于古代的奴隶，也不同于中世纪的农奴，而成了历史上最先进最有发展前途的阶级，成了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马克思说："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② 工人阶级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而使现代文明得到保存，并且创造更高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新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是新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也还必须在实践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恩格斯说："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9 页。

新人来。"①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要有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党领导下的思想教育工作。这是因为：虽然"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② 但大工业本身还不能使工人阶级自发地产生出共产主义思想来，而必须从外面"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这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旧意识、旧心理和旧习惯的影响和外来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列宁说："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③ 列宁说的虽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的状况，但这种状况的改变，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的。列宁说："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末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④ 只有在这个斗争中，才能使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成长起来。因此，我们如果从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来看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2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6页。

系，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人成长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没有这种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不过是空中楼阁；但是，这种物质基础还只是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这种可能的实现，还要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物质文明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的作用是直接的；但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无疑会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着极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因为他们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只有落实到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上，才能真正实现它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社会主义新人是全面发展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社会主义新人应该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四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它们大体可归纳为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新人，不但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风貌，而且要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两方面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果在人们身上的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新人全面发展的含义，是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的统一。要实现这个统一，就要反对把共产主义思想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程度高思想觉悟就一定高，但是从总的来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致的。如果这两方面有所偏废，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

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新人全面发展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将会逐渐缩小直至归于消灭，从而造就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更高水平上结合的一代代新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①这样一种远景。当然，现在还做不到这点。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存在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就有个如何对待脑力劳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要求：“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第38页）他还再次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第86页）的观点。这既反对了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为阶级对立的错误，又反对了抹煞这种差别，要求知识分子处处与工人农民“划等号”的错误。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使体力劳动逐渐脑力劳动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质差别的消灭，体脑结合的新人的成长，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全民族思想觉悟与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它们也是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关于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与领袖关系的光辉论述

张 义 德

关于群众路线，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文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总结了我们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也吸取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并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东西

在我们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以后，邓小平同志致力于纠正"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他针对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第39页)。而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这是因为：第一，"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第

42页）第二，由于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被破坏得最厉害，因此，“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第42页）可见，邓小平同志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之一提出来，既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也是针对党内的实际情况的。

那末，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作了科学的概括。他说：“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邓小平同志所阐述的这两个方面，前者就是群众观点，后者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我们党的工

作中的群众路线。作为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观点的具体化。具体说来，群众观点包括以下基本观点：(1)相信群众的观点；(2)为人民服务的观点；(3)对人民负责的观点；(4)向人民学习的观点。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具体运用，从而概括出来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既是认识路线、认识方法，又是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基本观点一样，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既包含着认识世界的一面，也包含着以这个认识为指导来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面；它既是社会历史观，也是改造社会的方法论。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之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群众路线同其他两个方面（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关系甚为密切。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着的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进到了更高一级的程度。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和认识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因此，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充分相信群众自身的创造力，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因此，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也是一致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有机联系、密切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和实践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了它们，就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群众路线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要理解群众路线，就不能离开我们党、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邓小平同志正是结合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来阐明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内容的。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第42—43页）这样结合毛泽东同志的实践活动来阐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使我们对群众路线的理解更加深切、更加具体。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而克服一切困难，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

能够克服。"(第200页)在革命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政党成了执政党，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以后，群众路线就更为重要。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曾提醒全党："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中正在滋长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群众路线在十年内乱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第200页)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群众路线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不仅是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的需要，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第202页)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新情况、新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第202页)

二、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在进行拨乱反正和领导四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是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作为分析问题、处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方法。他强调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第327页)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分析我国历史转折和四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也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首先，人民群众的力量、人心的向背，是历史转变的决定因素。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内乱，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谈到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是集体的力量。"(第308页)并认为粉碎"四人帮""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同上)。"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第308页)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肯定地说："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第309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能够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困境里走出来，最根本的也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第308页)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我们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得人心、顺民意的，是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因此是正确的。"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第308页)

但是，今天我们在讲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历史转折关头的决定作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决定作用同党的领导的作用统一起来，而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去歌颂群众的自发行动。邓小平同志说："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象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第156页)这并不是否定群众的决定作用，而是要求党的组织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从而使群众的行动更加自觉，更能发挥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要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区别开来。在一定的历

史条件下，开展群众运动是体现群众路线的有效方式和方法。如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是实现我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历史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很好地体现了群众路线。但是，即使在这时，群众运动也不是体现群众路线的唯一方法。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在党的一切工作中，包括不搞群众运动的工作中。由于在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方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些同志中就产生了一种盲目性，他们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产生了似乎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他们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不顾各种工作的具体情况，而要求一切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①，这个估计是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进行经济建设和改变生产关系，历史证明这样做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从而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五十年代后期以后，我们的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之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因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而也背离了群众路线。至于“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之后，我们进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时，多次强调不再搞政治运动。他说：“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第308页)不搞政治运动，才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有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情况同革命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照搬革命时期的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第296页)群众的思想教育问题，是群众自我教育的问题；现行制度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更新。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不能搞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但是，不能大搞群众运动。在这里，把实行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区别开

来，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如奴隶主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有民主思想，也实行过民主制，但他们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的思想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例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是从"天赋人权"和英雄创造历史等观念出发的。与此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特别是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出发的。因此，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民主，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都是与群众路线一致的。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解放思想的时候说，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是解放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指出："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第134页)因此，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有群众观点。邓小平同志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第134—135页)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在这里，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第134页）。而发扬民主，就是要放手让群众发表意见。“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第135页）这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党的领导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而化为领导的正确意见以后，再回到群众中去，通过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指导群众的行动。因此，群众路线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一致的，也是同民主集中制一致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第290页）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偏差，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下面就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三、正确理解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

关于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第40页）

在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群众需要自己的领袖，而且必然会在实际斗争中造就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来。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 各个阶级都是如此，无产阶级尤其是这样。另一方面，任何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或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作为一定时代和阶级的群众的代表时，才能成为领袖人物，才能起到组织和领导本阶级的群众前进的作用。在这里，领袖人物(或杰出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的作用所决定的。当然，人民群众的这种决定作用，时而明显，时而隐蔽，但这种作用总是存在着的。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的领袖同剥削阶级的领袖是根本不同的：剥削阶级的领袖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自己同群众的这种真实关系(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们往往难于认识这种真实关系)，而把自己同群众的关系颠倒过来，看成是超乎群众之上的关系(作为小生产的劳动人民的领袖也有类似的状况)；而无产阶级的领袖则不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同群众之间的这种真实关系，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广大群众的代表，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而不是群众之上的超人。对于二者的根本区别，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过很好的概括："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因此，在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重视领袖的作用，又不能夸大领袖的作用；既要尊敬和热爱领袖，又要反对把领袖神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在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不但有许多正确的论述，而且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力戒骄傲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并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① 党中央历来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这都说明我们党是厌弃对于个人的崇拜的。在肯定这些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应该指出，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的这个论述，还仅仅是一种理论分析，对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来说，还仅仅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但是，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再来回顾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述，我们不能不痛心地看到，个人崇拜曾经在我国和我党的历史上变成了现实，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邓小平同志在那个报告中提出的“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的任务，并没有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3页。

正地贯彻执行。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在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历史时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第290页)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其中破除个人崇拜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例如，邓小平同志在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35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个凡是”是一个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方针。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就把毛泽东同志神化了。这样来对待毛泽东同志，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是不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第35页)“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每句话都看成绝对正确，从而把毛泽东同志神化，这实际上不是真正尊重毛泽东同志，而是损害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思想;这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而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纠正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才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

面貌，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是真正尊重毛泽东同志。

个人崇拜既然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那末，我们就不仅要在实践中批判它的错误的表现，而且要从理论上分析它所以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例如，不能仅仅追究个人责任，不能把它的产生仅仅归结为个人品质。就是说，对这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它、对待它。只有这样，才能纠正过去的个人崇拜并防止产生新的个人崇拜。对此，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就发生于我国的个人崇拜现象来说，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但它的根源却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弊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第307页）我们党在领导反封建的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滋长起来。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们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集中制和领袖的特殊作用，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其中包括党长期处于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状态所形成的。这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要的。但

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如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执政、由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由革命转为建设等），也没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再加上经验不足和其他原因，没有能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对领袖实行监督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起来，造成了严重危害。

第三，与某些具体制度有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293页）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当然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指具体制度。由于具体制度上的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上）

第四，领袖本人有一定的责任。由于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使得领袖享有极高的威望，党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使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正确解决领袖和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邓小平同志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为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作

了很大的贡献。在谈到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的意义时，他指出突出宣传个人的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第290页)。他提出"从改革制度着手"，来解决个人崇拜、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等问题。这不仅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道路，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四、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时，决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从这个观点出发，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重要思想，如关于尊重人才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作用的思想，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作用等。这些思想，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关于尊重人才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第37页）以科

技为例，他提出要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科研要靠教育输送人才，因此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各行各业都要重视人才。他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第47—48页）显然，反对"天才论"，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与尊重人才是一致的，因为各种人才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在剥削制度下，大量人才被压抑；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能够为大批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的。因此，在讲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方面的要求：发展生产力，发扬人民民主，培养、发现、提拔、使用优秀人才。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造就和选拔优秀人才提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来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第286页)。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二）对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

马克思主义不仅一般地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特别重视领袖的作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群众的利益，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列，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地形成的。这样的领袖不是孤立的一两个人，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领袖的威望，就是党的威望、阶级的威望、人民的威望，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因此，决不能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衷心热爱，同对个人的盲目崇拜混为一谈；不能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维护领袖的威望，同把领袖神化混为一谈。我们党反对把领袖神化，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同时也坚决反对那种否认领袖的作用、否定任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同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主义进行斗争，恩格斯写了著名的《论权威》的论文。恩格斯以工厂生产、列车运行、航海和革命为例，论证了权威的必要性。他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① 这就是说，权威和服从的关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恩格斯还说："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② 一般地反对权威，不是散布糊涂观念，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运动。恩格斯这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所说的权威，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和领袖。恩格斯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在十年内乱中，一方面是个人崇拜盛行，另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在那时，“踢开党委闹革命”，使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使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混乱，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又改头换面地出现，有些人公然散布削弱以至取消党的领导的言论，便是这种思潮的表现。邓小平同志及时指出了它的危害性：“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第157页）

在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十分注意维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特别是阐述了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尊敬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第159页）这就是说，在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把领袖人物神化的同时，我们应该把无产阶级的领袖放在革命事业当中加以科学的历史的评价。邓小

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第138页)所以，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永远纪念。

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出发，才能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与过。首先，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第158页)一方面，要反对那种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的"两个凡是"观点，因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第262页)另一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也应当恰如其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第262—263页）其次，在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要着重分析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第158页）在这里，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第265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第261页)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第三，要公正地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第260页)当然，毛泽东同志的责任是主要的，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定责任。这样认识问题，也是有利于取得教训，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最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271页)通过这样的分析，不仅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且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三）珍视领袖的理论贡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同其他无产阶级领袖一样，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以后，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但经过邓小平同志和全党同志的努力，这个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在这里，区别的标准是实践。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

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第325页)。“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第157—158页)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它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十年内乱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必须把它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根据这种区别,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一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态度的共同点,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第264页)

第二,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

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第139页）这就是说，仅仅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时，不但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而且强调“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第139页），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不但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而且在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记录。

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林京耀

《邓小平文选》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容。邓小平同志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在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国情，并作出正确的决策。反映在《邓小平文选》中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将继续指导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乘风破浪前进。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哲学思想，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新时期学习和运用哲学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在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们手中的锐利武器。

学习哲学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建议

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第267—268页）。第二天，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说："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第336页）“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第337页）所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从哲学世界观、认识论上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它们都是从根本上、即从哲学世界观、认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因此，把它们列入哲学著作、逻辑著作的范围，完全是不过分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方法，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的根本方法。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纷纭复杂的。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它们各各不同的奥秘，这不是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而是各门具体科学的课题。例如自然界的生命现象、物理现象，这是生物学、物理学

的课题；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则回答人类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问题。哲学所提供的是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观察上述各种现象的根本认识方法。列宁说过："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①这就告诉我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不提供包罗万象的知识，而只提供"唯一科学的"说明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史上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最伟大的认识工具。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也就在理论上打下了最好的根底，就可以使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学哲学。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②这里所说的共同语言，就是统一思想，反之，就是思想不统一，就是无休无止的扯皮。有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6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就有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方法，思想就比较容易统一了，即使一时统一不起来，也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方法，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最后达到统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对于这许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提供具体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方法，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按照这个辩证的、唯物的方法，我们就能够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之所以在一系列问题上持错误的认识，在实践中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归结到一点，就是它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哲学上没有共同的语言，认识问题没有共同的方法，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就不可能达到一致的认识，即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暂时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遇到别的问题又会扯皮。拨乱反正的历程所提供的一个基本经验教训，就是要学习哲学，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思想方法。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① 设计这项伟大的创造性工程的施

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59页。

工蓝图，这并不是哲学的任务。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确立合理的理想目标和为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最根本的方法。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我国国情和新时期的国际环境，进行科学决策的锐利武器。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这个武器，我们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设计好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并在施工的过程中认识和处理好各种矛盾，紧紧围绕着我们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发展中，适时做出正确的抉择，把各项工作做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说的两个"改变"，也就是改革。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改革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在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将不断地出现许多新现象、新事物，有不少是我们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新现象、新事物往往同我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框框发生矛盾。邓小平同志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其中，认识上的障碍，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框框。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需要哲学的帮助。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底比较扎实，我们就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去分析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善于区分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前进中出

现的新问题和遇到的挫折；而不至于只看到一些现象就发议论，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要求新的事实、客观情况符合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事情尽管不可思议，但它还是发生了。例如有的工厂长期亏损，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广大职工有意见，上级部门也把它当作包袱。即使如此，有关部门眼看这样的厂垮台而毫无办法，甚至不焦急、不说话。但当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或一个有开创精神的干部把这个厂救活了，生产发展了，国家和企业职工都得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来看着这个厂垮台而不焦急、不说话的人出来说话了，他们的本领就是找毛病，根据一些老观念、老框框对改革者、创新者横加指责。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固然很多，但这里面都有一个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给我们的，不是机构改革具体怎么做，农村改革具体怎么做，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怎么做，而是教给我们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分析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种哲学思想的启迪，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学好、学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易，要运用于实际就更加不容易。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那么几条原理，辩证法就那么几条规律，学懂、记住还不简单？事实上，真正融会贯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容易。至于把学懂了的哲学道理用来分析和说明实际问题，做到运用自如，那就更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了。在现实生活中，一面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面又违背唯物辩证法，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例如，辩证唯物论有一条基本原理，叫做主观要符合客观。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恰恰把它倒过来，要客观

来符合主观，遇事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让发展了的客观事物符合现成的概念，如不符合，就说发展了的客观事物违背了什么"原理"，企图阻止事物的发展。我们知道，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与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又如，调查研究，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做起来却不容易，遇事不调查，不研究，这还是常常见到的；或者是滥用实例，一心抱着要证明某种既定的观点去做"调查"，把否定自己观点的实例选掉，把能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实例留下，甚至任意歪曲、剪裁手中的事实材料，使之符合自己的观点。这种"调查"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论一定是不可靠的。如果以这种结论作为决策的依据，势必造成工作中的失误。至于不善于从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看不清事物发展的本质和主流，这种情况在认识过程更是常常发生的。这些都说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本身也是一个艰巨的学习过程。

在机构改革中，大批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是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为了指挥好现代化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我们广大干部面临着重新学习的任务。学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固然十分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级干部来说，这是共同的基本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许多干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参加工作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道理，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知道得太少了。这种状况已经和正在给工作带来消极的影

响。斯大林在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的时候说:“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① 陈云同志建议学习哲学，邓小平同志说“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

有系统地学习“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耐心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释这些基本理论，这决不意味着用静止的、凝固的观点去学习、解释这些理论，而是用发展的观点去学习、解释这些理论。陈云同志讲到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丢掉了实事求是，就等于从根本上丢掉毛泽东哲学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7 页。

思想，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真理，我们是要不断地重复的。但这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地、逐字逐句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讲过的关于实事求是的话再讲一遍，这样重复不仅收效不大，而且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我们的哲学宣传教育，包括我们学校的哲学课，之所以不能吸引人，不能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讲的内容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同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蓬勃发展的现代科学相脱节，这就降低了哲学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内容入手，要使我们的哲学理论、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原理，充满时代的气息，要总结社会实践的经验，概括自然科学的成果。这样，哲学才能真正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哲学活动，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就看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③，因此，“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这里说的是“自己时代”，即哲学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应该同自己的时代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如果它脱离现时代，不回答现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那它就失去了生命力，而只是哲学家书斋里的东西。在我们国家，哲学作为一

①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0页。

种精神产品，除了很少数中外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还不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而只能为哲学工作者和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人所接受以外，都应该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食粮。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劳动的精神产品，相当多的数量主要还是在哲学工作者的范围内"自我消费"，这就很难发挥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对于这种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情况，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并不满意。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很少有人问津，心里当然不是滋味。这里，归根到底，还是哲学是不是体现了自己时代精神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僵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第167—168页）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它的基础——哲学。邓小平同志还说："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第123页）僵化了的理论是不会有人问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按照我们党的一贯教导，象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那样，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这是新时期哲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两方面的新情况、新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知识）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哲学工作者加以回答，作出新的哲学结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践论》、《矛盾论》、

《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哲学著作或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著作，从哲学上概括了中国革命所提供的新鲜经验，这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哲学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从哲学上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并对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实践中没有完全遵循他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甚至违背了这些哲学思想，但这些著作仍然是光辉的哲学篇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不同于过去的民主革命，而且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与过去不尽相同。我们是在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靠引证前人的哲学著作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依据新的经验，包括当代各门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这些知识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对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多的，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等等，都需要作哲学的思考。从认识论来说，我们现在的决策过程应该有、而且已经有许多新东西，需要我们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新的哲学概念和理论。经过我们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写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完全可能的。从新的实践中产生的哲学，它所反映的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能只是证实前人所提供的结论和概念，而是以新的语

言、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正在兴起新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向哲学提出新的课题，说它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挑战者，从思想理论来说，就是提出问题要你回答。挑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循守旧，回避或不回答这种挑战。不能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以及信息论、系统论等等的产生和发展，只是证实了现有的哲学结论，而不会带来新的哲学结论。事实上，有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对诸如哲学物质概念、时空观念、因果观念、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等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美国研究未来的社会学家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有一部分内容多少反映了人们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哲学思考。《第三次浪潮》的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他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即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方法，即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是有见地的。从哲学认识论上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提出新的哲学概念，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不仅是哲学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开创哲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这已经是摆在我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有条件比别人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在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进行哲学概括和总结的过程中，以及在利用外国学者所提供的思想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观点或学派，这是不可避免的。不

仅如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得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概念和结论。对于前一种情况，正确的办法是展开百家争鸣，通过百家争鸣，互相取长补短，促进哲学科学的繁荣。对于后一种情况，只要不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不是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就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搞精神污染。在探索新的结论的过程中，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是允许的。在对新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只许走直路，不许走弯路，只许正确，不许犯错误，这本身就是违背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百家争鸣，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纠正错误，达到真理的途径。

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哪怕是在一个原理、一个概念或范畴的发展上作出一点贡献，在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上有所前进，也是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哲学史上所提供的思想资料，是我们继续把哲学科学推向前进的基地，它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无疑具有启发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人专门从事“史”的研究，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哲学史科学作出新的贡献；而且，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熟悉哲学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可能把前人已经提供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新发现、新创造。但是，前人的哲学思想，无论它是多么正确，多么有价值，它毕竟是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结晶，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认为前人所提供的哲学思想，包括哲

学概念、范畴，已经能够说明现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已经能够说明现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我们只要搬来用就行了，那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太省事了。事实上，无论前人做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劳动都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劳动。因此，要能够在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贡献，还有赖于我们重新深入实际，对当代、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进行新的哲学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要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落后状况时说："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第167页）邓小平同志这里说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哲学工作者在内。因此，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思想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哲学工作者的要求。从哲学研究工作来说，所说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第二，深入自然科学的实际，直至深入到当代科学的前沿。这两个方面都是哲学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从哲学研究工作的整体来说，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把我们的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把哲学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好。同时，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对于四化建设各个领域中的问题，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现代科学的发展，离开最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那就不能很好理解，甚至会从小生产的传统观点来观察问题；反过来，如果在深入当代科学发展的实际的时候，完全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脱节，完全不搭界，那也不能很好理解。所以，这两方面的实际，在我们的哲

学研究工作中应该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得越好，效果也就越好。当然这种结合并不否定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可以有所侧重。

在多层次的科学知识体系中，哲学同数学一样，是比较抽象的一门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同生活无关。关注和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对其中的一、两个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研究，了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以及所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了解我们的一些重大决策过程，等等，把发生在广大干部和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提升到哲学理论高度来思考和说明。这样的哲学才易于被干部群众所理解和运用。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概念、范畴，哲学尤其如此。但是，如果老是在书本上的概念、范畴中兜圈子，这样的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只有深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中去，才能作出合乎实际的哲学结论。例如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普遍推广，其中有十分丰富的哲学道理，无疑是要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但如果对农村这一伟大改革的过程缺乏深切的了解，而是从想当然出发，甚至从现成的抽象概念、范畴出发，去对这个改革进行哲学分析，以证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是符合现成的概念、范畴的，这样就使得这个本来并不难理解的实际问题反而变得不好理解了，这种概括和总结并没有给哲学理论宝库增加什么新东西。反过来，如果深入实际，在调查研究中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即使在描述这个过程时还讲不出多少哲理性的东西，甚至“哲学味”很少，但它在哲学上给人的启示和教益，要

比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哲学分析大得多。而且，类似这种实际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为从哲学理论上进行总结、抽象打下扎实的基础。所以，深入实际，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在今天，就是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接触，这是哲学从内容到形式上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关键。否则，哲学就会成为空谈，既不能坚持，也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深入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特别是深入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这是哲学工作者深入实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自然科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础，自然科学的现状及其历史，同样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的知识领域。列宁教导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① 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研究人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这并不是可以忽视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实际上，对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并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来说，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列宁本人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不仅深入到科学技术史中去，而且深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发展的实际中去，密切注视自然科学的进展，他阅读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著作，熟悉这个时期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普朗克、爱因斯坦、约·汤姆生、马赫、昂·彭加勒、冯特、奥斯特瓦尔德、杜恒，等等。由于列宁熟悉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因此，他能够在唯心主义的进攻面前，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告诫哲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

学家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否则，战斗唯物主义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列宁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说是列宁的哲学遗嘱。当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比列宁所处的时代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就不可能了解自然科学最新革命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并给予科学的回答。回答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统一所提出的哲学认识论问题，不仅将促进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将促进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及其统一的趋势。

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应当在接触社会实际、深入自然科学领域这两方面，努力开拓，锐意进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后　记

《邓小平文选》出版以来，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党员和群众越来越感受到革命理论的力量，越来越认识到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文选》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文选》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集中地体现在这部文选里。从哲学的角度来学习《邓小平文选》，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党中央在新时期所制订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而从根本上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高抵制"左"的和右的干扰的自觉性。这本文集，是作者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的初步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文集，引起哲学工作者对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问题的兴趣，引起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

林京耀同志参加了书稿的组织和部分编辑工作。

对于本书的缺点错误，我们期待读者给予批评指正。